

見 觀 察

· 元千三畫份每 · 日六十月四年〇五九一 · 版出六十 · 一第

期二十第



卷六第

政府通盤調劑全國糧食 (社論)

近代科學推翻了馬爾薩斯人

口論

爲什麼要先打好社會主義的

物質基礎?

中學國文教學的研討

座談會

關於董時進上書反對土地改

革問題

思想與生活

進步的包袱

記華東大學學員唐世岑的轉變

費孝通 劉秋鳴

京漢道上

記東北春耕以前的備耕工作

江橫 王政

南京大學政治學習的具體

情況

記浙江大學的工讀互助運動

田欣 貝加

人物及事業

華羅庚教授回到了祖國

孫執中

讀者觀察

讀李陳關於我父許壽裳在台北被殺

是政治性暗殺二文後

許世璋

AAAF 1310312

(上接第三十頁)

法敷衍說：「我們請你幫忙破案，請暫留此地」。我知道這明明是要看管我，報上早已登過說我姊夫哥哥請求警務處看管我的話，我目睹這批特務所使用的挑撥離間的手段，覺得國民黨做事卑鄙無比。至午夜後，忽然他們拿來一張名片，問我認不認識，是白××(名字已記不清)就住在

我家對門，係白崇禧親屬。我說沒見過，父親也不和他往來。又問我有沒有姓簡的朋友。這樣問了二句後，便說：「你可以回家」。劉戈青假作殷勤，送我回家，直入我寢室，開啓我書房，我書房中除少數幾本自然科學書外，都是魯迅先生的著作。劉戈青這種行為，其用意何在，不言而喻。至次日下午四時，警務處忽宣佈已破案，兇手為高萬傳。以後的事情，李陳二文說得很明白，茲不再贅。

國民黨特務說陳耀祥殺我父親，無論在情理上和所捏造的證據上來看，都是極牽強的。我和陳在台大為同院同學，在台大念書的內地人極少，我又不曾說日本話或台灣話，和台灣同學不易接近，所以我和陳特別接近是很自然的。他常來我家，幫我處理若干事情，但談不到有什麼愛情，更談不到婚姻問題。陳君一向尊重我父親，我父親也不反對我和他往來，憑什麼他要殺我父親？警務處捏造的證據，他們自己也明知是無的放矢，但如要公諸報端，加以渲染。而且自我姊夫和二哥從滬飛台後，特務即以卑鄙手段進行離間，單獨說服他們。更有甚者，據陳在釋放後回述其被監禁時情況，說警務處用人用砲轟轟炸法從晚上七時至翌晨五時進行連續轟炸。第一夜對陳說：「許世璋已招認是你殺死姊夫父親的，你快承認了吧！」但陳不予理會。第二夜又換一套說法：「許世璋已供認是你主謀，你是從謀，她對你並不好，只相借你之手殺他父親。諸如此類不近情理，無人能信的神經病式審問，其目的顯然是要使陳不堪其擾而屈從。從他們利用國民黨黨報中華日報造謠中傷破壞名譽的

種種作為來看，顯然是企圖用白色恐怖毒害蓋政治性暗殺陰謀，所以不惜妄造證據，蓄意謀害。其後看到陳絲毫動，我則態度強硬，不為其破壞名譽而有任何震動，台大全校也詳情憤懣，知道這詭計行不通，於是發表了破案的消息，說兇手是高萬傳。

高萬傳是我父親做編譯館長時的工友，台灣人，開時來我家中幫忙整理庭園。我父親沒官架子，對同事工友一視同仁，並沒有絲毫虧待他的地方，而高也從未不滿我父親。編譯館撤消後，成為編審委員會，高仍留館中。事變前數日，他突辭職，據說另有高就。行兇當晚，據他供認：是想偷竊東西，不料被我父親發覺，看到我父親手拿白色東西，疑是手鎗，故下手云云。事實上，我父親死時手足肌肉鬆弛。面容安祥，一無恐怖緊張之色，顯係在睡眠狀態中被殺，即使是李季谷(從陳醒民文章中看，該人是兇兇)，也說我父親是熟睡中遭到毒手的。警務處人說恐是電到帳內動態，若電筒筒為父親使用，無法看到帳內動態，若電筒筒為父親使用，扭亮了，則兇手也不會糊塗到認為是手鎗，而且事實上父親的電筒筒我明明看到仍在枕邊，所以這種說法也是不能成立的。兇手除公審時的「口供」外，我們就根本沒法和他單獨談話。法院會帶來表演行兇經過，但恰於此時，我被招至警務處取回偷竊之物，我哥哥和姊夫如何措置，我不知道。而最荒唐無稽的是破案線索：據警務處告訴我們那夜對門白家出一怪事，庭院中二把掃帚忽被擲進門來，繼又發覺廚房玻璃窗上插有桃樹一枝，白家大驚，即報警。警務處研究認為掃帚為竹，擲進白家為「簡」，桃樹一枝暗射桃國，事發在白家乃是事情大白之意，故問我有沒有姓簡的朋友。由此可知說高是偷竊殺人犯，並無任何科學證據。再從審判過程中，反動派對法院之威迫、牽制、監視、妄定死刑、

提早海口種種事實看來(詳陳醒民文)，更足以正面證明反動派的蓄意陰謀。這次暗殺，比李公僕開一多事件是「高明」得多了。反動派會費費了一番苦心，想借刀殺人，掩盡天下耳目。可惜人民的眼睛畢竟是雪亮的，不管反動派如何狡詐，終於掩蓋不了他們的獍豸面目。

關於我父親的為人，比我更知道的人很多，李何林先生的文章也已詳述過，我也不再重複。記得抗戰勝利那年，父親自滬返滬，痛罵國民黨是腐敗無能，說在重慶唯有新華日報的消息是正確的。他會啓發了我，使我對國民黨從不存任何幻想。我和他一年多朝夕相處，體驗到的印象是我覺得我父親為人忠厚，富正義感，但缺乏魯迅先生的戰鬥精神，這是他的弱點。他雖不滿蔣匪幫獨裁政治，在校同情學運，愛護學生，我參加反對美軍舉行遊行時的，他非常贊成，認為美軍在華是萬萬不行的，必須打擊美帝。我還記得有一次家中正請客，有一位青年來我父親，因那青年在報端發表文章，譴了警務處之惡，那青年因痛罵他供職那公司的貪污，被停職了，希望我父親能有所幫助。但那時我親正忙於會客，我又忙於做家，就請我哥哥去見他，請他次日再來，我父親且曾考慮到為他介紹事情，但該哥却回絕了他，事後父親和我談起，十分難過，怪我哥哥不該如此。他說那位青年一定很失望，他又做了件錯事。父親在台理頭寫回憶魯迅先生的文章，「亡友魯迅印象記」內中有幾段是屬反動政權的，同事會勸他刪去。他對我說：「這怎能刪去？一刪的話，意義全失，我年紀這樣大，怕什麼？」就這樣出版了。他常指導我要學習魯迅先生性戰鬥的精神的。反動派多方誣蔑歪曲魯迅的人格，想動搖廣大青年對魯迅的信仰，是極其卑劣的手段。」在家時，他對我管教甚嚴，對我功課甚注意。我在台大一年半總是第一名，他很高興。對於陳耀祥

我表示和他很好，但決談不到婚姻。父親也不反對，因他很尊重子女的意見和自由。平日常談誼我「招蜂引蝶」，父親看到並不和我談起，也並不因此而對我懷疑，因他平時注意我，教育我，希望我努力進步，並信任我的行為和舉止。

我父親的死，教育了我，使我親眼看清反動派的獍豸面目，他們為了挽救垂死的法西斯統治，是如何不惜用一切卑劣無恥的手段，摧殘文化事業，殺害有正義的文化人士。我們只有集中全力解放台灣，澈底消滅反動派，才能算這筆血債。

十二、全心全意全人民服務

(上接第二十一頁) 學習已快結業了大家在一起討論着「應怎樣的走上工作崗位」？老唐很莊嚴的發表了自己的意見：「我們吃的是人民的糧食，穿的是人民的衣服，學習的是人民的學校，我們應該無條件地服從組織的分配，人民需要我們到那裏去工作，我們就應該到那裏去工作。我保證

清個人主義，絕對服從組織分配，不擇地區，不講價錢，愉快地走上工作崗位，要起一個忠實的人民勤務員，在革命中至少對共產黨，我深深感謝華東大學給我的教育」。老唐講這話時，他在感情上已經靠攏了組織，他已申請爭取入團，兩月了，因為組織上正在審查，覺得對他應該考驗一下再吸收。在不久以前華東大二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同學對於分發工作，大家都堅決地無條件地表示了一絕對服從組織分配的態度。老唐便是其中之一。在二月二十一日，老唐愉快地走上了工作崗位，他歡天喜地，揹着學校發給他的(行李)背包，用很響亮的政治感情來說：「人民給了我的背包，我好好地負起來，愛護起來，始終記着我們穿的都是勞動人民創造出來的，我若不為人民服務，那便是一個最落後最落後的青年，今天，我要揹着人民給我的背包，好好地為人民立功。」說畢老唐就向工作崗位——魯中南走去。三月十一日于華東大二部脫稿

發行者：觀察社

編輯部：北京(25)交道口大
街北吉祥胡同二號
電話：六一九六號
發行所：(1)上海(5)北四川
路一九七二號內一號
電話：(8) 5555
電報掛號：引九〇〇
二七七
北京(25)交道口大
街北吉祥胡同二號



本期作者

- 竺可楨：科學院副院長
- 茅實家：東北教育月刊編輯
- 張雲樞：
- 費孝通：清華大學教授
- 劉秋鳴：華東大學學員
- 江橫：
- 王政：長春勿錄報記者
- 田欣：南京大學學生
- 貝加：浙江大學學生
- 孫執中：清華大學研究生

社論

政府通盤調劑全國糧食

在目前我們這個基本上還是一個農業國的社會裏，糧食問題將還是一個壓倒一切的中心問題；它不僅關係到軍糧民食的供應，而且還會影響到物價的能否穩定。爲了在這個重要戰線上取得勝利，去年十二月下旬財政部召開全國糧食會議，決定了一個在全國範圍內通盤調劑糧食的偉大計劃。三月十三日新華社報導：這一偉大計劃正在逐步執行之中。

中國的糧食之成爲問題，不一定完全由於糧食在數量上的缺乏，「重要的原因之一，是缺乏在全國範圍內的通盤調劑」。因此，一方面，我們在抗戰以前的幾年，入口外糧最高時年達四十億斤，最低時每年也在四億斤以上。而另一方面，「與這種情況同時存在的是，許多產糧區有大批餘糧找不到銷路，形成較嚴重的畸形現象」。這種現象和我們社會的長期封建性和殖民地性的特質是分不開的。人民政權成立以後，對於這種不合理的經濟結構，必須加以改造；但在改造的過程中，免不了要發生一些困難。去年的三次物價漲風，都是從糧食這一項所引起的。去年四月自北京開始的第一次物價漲風，主要是因爲京津解放不久，東北和華北兩地的解放軍雲集這一地區，加以春旱不雨，所以便從糧價上漲而引起全面的物價波動。去年七月從上海開始的第二次物價漲風，也是由於國民黨匪幫撤退時掠走了大批米糧，而第二、第三兩野戰軍又都集中在滬甯一帶，所以那時上海物價波動得最厲害的還是糧食，日用品等項反趨下跌。去年十一月的第三次物價漲風幾乎是上海和北京兩地同時開始的，其起因還是在糧食。以北京爲例，北京糧食的主要來源有「口小米」和「冀中小米」兩種；當時察北鼠疫，京綏路中斷，「口小米」缺乏來源，而邯鄲等地區棉區由於棉花上市，棉農急需購進全年的糧食，所以「冀中小米」在當時也成了倒流的情況，以缺糧爲主的種種原因，促成了京市一帶的糧價狂漲而影響到其它物價的波動。總結去年北京全年的物價，紗布上升四十三倍，糧價則上升在六十倍左右。可見我們雖然是一個農業國家，而糧食戰線的確是在著的！

糧食戰線的問題，在蘇聯十月革命以後，也曾同樣的發生過，而且比之于我們目前的情況還要嚴重。「戰時共產主義」時期由於種種原因使當時的蘇維埃政府不能掌握足夠的糧食，只好實行糧食配給制。工人有時每兩天只能領到八分之一磅的麵包，甚至還有完全領不到的日子；這種情況，一直到一九二一年新經濟政策開始實行以後才逐漸好轉，但困難依然沒有完全克服。甚至在一九二七年的時候，由於農業經濟結構發生了變化，從地主富農的大農場過渡到中農經濟和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分得了土地的農民，第一步是在改善他們自己的物質生活狀況，收穫的糧食大部份首先要留給自已食用，極少數的可以賣出，這樣，便在糧食戰線上發生了一個新的問題——商品糧食的減少。蘇聯一九二六——二七年的糧食總產量大約和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相等，而商品糧食則從戰前佔總產量的百分之二六降落到只佔百分之二三。三〇；商品糧食的缺乏，是會影響到工業建設的發展的，特別是在當時工業比重相當大的蘇聯（一九二九年蘇聯工業佔35.5%，農業佔25.5%），這個問題顯得更爲嚴重。

目前我國老解放區已經實行土改，一九五〇年秋收以後新區也將逐漸實行。有人想到原來在半飢餓狀態中的貧農羣，一旦分到了「三畝園子五畝地」以後，其第一步也將是先使自已吃飽肚子，這樣，會不會同樣的發生商品糧食缺乏的問題呢？這個問題，當我們讀完了最近新華社關於「全國糧食實施通盤調劑」的報導以後，可以消除了。我們的商品糧食的主要來源將依靠公糧。我們現時的情況和蘇聯十月革命時不大相同，我國目前農業比重大，非農業人口比較少，俄國當年則農業比重小，非農業人口比較多，而且，俄國的革命是從城市走向鄉村，而我們這次的解放戰爭則是從鄉村走向城市，農村所受到的破壞比較少而革命政權在農村內的威信也比較高，這樣，就必然保證了我們在公糧收入上的穩定性。最近寒假期內曾到京郊去參加過土改工作的人報告，根據幾個行政村的調查，去年每一農民的農業稅負擔約爲七十五斤小米

· 觀 ·

左右，如以五分之一的非農業人口計算，則每四個農民可以負擔一個非農業人口的商品糧食。四個農民的公糧負擔是每年三百斤，平均每一非農業人口的糧食需要量每年約在四百斤左右，這樣，只要政府能掌握了公糧，也就解決了商品糧食的主要部分。上述新華社的報導告訴我們：「除去軍糧和它必要的支撥外，公糧的其餘部分全部交中央貿易部調劑市場。這批糧食數量巨大，佔全國市場商品糧食的主要部分，只要能夠有計劃地予以合理使用，國營糧食公司就有充分的力量領導私營糧商，解決全國的糧食供應問題。」這一點，人民政府的具體措施是：在北京，合作社的糧食出售，以前在機關內有一定數量的限制，在普通市民內，只限「貧民戶」，而自三月份起則這些限制已完全取消，任何人可以隨意購買。在上海，起初，「許多人不相信糧價可以不漲，於是買呵買呵，而上糧公司始終供應不漲價，於是買呵買呵，物價穩定了，而且微跌。爲什麼？主要的是由於糧食無缺，上糧公司無遮擋的供應大米麵粉。中白麵始終穩定於每石二十七萬元左右，特約零售上白麵始終穩定於二十八萬五千元左右。」（上海大公報三月十七日社評。）

首先穩定了兩個主要城市的糧價，再配合着其它的財經方面的種種措施自三月份起，全國各地的物價不僅穩定，而且開始回跌。現試以全國五大城市的折實儲蓄牌價爲例：（單位：元）

三月一日	六、二〇五	六、五四六	五、六三六	八、五七五
三月廿一日	五、八八五	六、〇五七	四、九三三	五、四四三
回跌	三、二〇〇	四、八八九	九、五二二	九、三三三

天津 上海 漢口 南京 廣州

物價穩定，對於今後經濟建設的恢復是有很大的貢獻的，這是在糧食戰線上經濟方面的勝利！

我們在糧食戰線上是會遭遇到若干困難的，其中一個主要的困難就是交通問題。根據新華社關於「全國糧食通盤調劑」的報導所說，我們這次在全國調劑糧食的範圍是極其廣闊的。「華北地區所不產的，以東北餘糧的一部分和內蒙餘糧的全部調劑；包括上海在內的華東地區缺糧數量最大，則以東北的另一部分和中南、四川的餘糧供應。」而且，由於去年若干地域的水旱爲災，同一地區內部的調劑也是不可避免的。「這種大規模的調劑是一個極其複雜的組織工作，這須要解決幾千里路程的長途運輸中各種各樣的難題，從鐵路、輪船到戰車、人力等等各種運輸工具和方法都將在充分使用之列。有關部門和地方政府正在積極配合這項工作。貿易部早已和鐵道部簽訂了合同，貿易部、

交通部也簽訂了合同。交通部正致力於組織長江的各種船隻。中南和華東分別組織了運輸委員會，除了中國糧食公司及其各地分支公司本身的人員之外，中南臨時抽調了其他的幹部三千人參加這項工作，華東抽調了兩千人，華北抽調了四百人。貿易部又直接派遺了大批幹部到各個交接地點去進行監督。」

中央人民政府在這次糧食調劑工作中，不惜動員這麼大的人力物力，不惜「賄貼」資金折合小米約在四億斤以上，除了穩定物價，還擊敵人的封鎖之外，另一個任務便是在維持產棉區的合理比價和保證災區糧食的供應。在我們這個傳統的農業社會裏，在過去，歷史上對付災荒的辦法是「河東因則移其民於河西」，甲地有災，災民便集結「逃荒」到乙地去就食，當乙地的居民也受了災時，又再「逃荒」到丙地……結果是災區的面積日益擴大，社會的秩序受到嚴重的擾動，而尤其重要的，這種聽任災民自流，是完全違反增加生產的原則的。今天我們人民政府的治理之下，就完全採取了新的不同的方式來處理這個問題。人民政府盡力防止災區的蔓延，盡可能使災區變爲輕災區，輕災區成爲非災區。人民政府決不坐視災民自生自滅，聽其自然，而是在基本上把災民組織起來，幫他們搞生產，搞副業，以渡過當前的春荒。而對於這些災區的糧食，政府絕對負責，克服各種困難，盡力供應。四月一日北京人民日報發表的中央人民政府內務部的統計：「僅華北五省及華東部分地區，從財政上撥用於救災的公糧就有十二億一千零九十萬斤。這些救災糧，一部分是無代價付給災民的，即急賑糧和救濟糧……；另一部分救災糧是結合着生產建設事業用的，即以工代賑糧和支持各種副業生產的糧食……；此外各地政府爲救災動用的地方糧及由各界人民爲災胞募集的糧食，尙未計算在內……。」

近代科學推翻了馬爾薩斯人口論

十八世紀末葉，英國馬爾薩斯出版了他的人口論。說人口的增加是依照幾何級數進的，糧食的增產是依照算術級數進的。所以人口增進的速度，若任其

自然，便要超出糧食增進的速度，必會釀成人口過剩的現象，而發生水旱災荒、瘟疫、或是戰爭。歐美資本主義國家的學者，常引中國歷史上災荒戰爭之多

根據一般估計，這次中國的災民，爲數約在四千萬人左右，其中災情嚴重、非救濟不可的，約佔五分之一。假定待救的災民平均以二千萬人計算，每人每月吃三十斤糧，則內務部發發的撥用於救災的十二億斤公糧，可吃兩個月光景，再加上野菜類的混合摻吃，我們是可以渡過當前這嚴重的春荒的。四月九日北京人民日報報導：全國各災區災荒基本上已經停止發展了。

這些事實都說明一點，就是人民的政府是絕對對人民負責的，是有辦法克服橫亙在我們面前的種種困難的。政府對於一切災區和缺糧地區的糧食，都要設法照顧供應。把全國的糧食通盤調劑，這在中國糧食史上雖然是一個空前的艱鉅的工作，但在連續地克服無窮無盡的困難中成長起來的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和偉大的人民領袖毛主席的領導下，今年在全國糧食供應的工作上，以及日後在建設我們的新中國的一切工作上，是都會創造出新的奇蹟來的。

馬爾薩斯人口論

三可楨

，為馬爾薩斯人口論的鐵證。他們以為這個人口論——就是說人口增進的速度，如漫無限制，一定會超出糧食增產的速度，而釀成窮困禍患——是馬爾薩斯所首創的。不知道馬爾薩斯同時比馬爾薩斯早一點，前清樸學家洪亮吉在他的「意言」第六篇裏，把馬爾薩斯人口論原理已經充分發揮了。他說：

「試以一家計之，高資之時，有屋十間，有田一頃，身一人，娶婦後，不過二人。以二人居屋十間，食出十頃，寬然有餘矣。以一人三計之，至子之世，而父子四各娶婦，即八人。八人即不能無備作之人，是不下十人矣。以十人而居屋十間，食田一頃，吾知其居僅備足，食亦僅備足也。子又生孫，孫又娶婦，其間養老者或有代謝，然已不下二十餘人。而居屋十間，食田一頃，即景腹而食，度足而居，吾知其必不敷矣。又自此而曾孫，自此而元孫，視高資時已不下五六十倍。是高資時為一戶者，至曾元時不分至十戶不止。……高資之時，隙地未盡闢，間隙未盡居也。然亦增一倍而止矣，或增三倍五倍而至矣。而戶口增至十倍、二十倍。是田與屋之數，常處其不足。而戶與口之數，常處其有餘也。」

「曰：天地有法乎？曰：水旱疾疫即天地調劑之法也。然民之遭水旱疾疫而不幸者，不過十之二三矣。曰：君相有法乎？曰：使野無間田，民無剩力。農士之耕闢者，移種民以居之。賦稅之繁重者，酌今昔而減之。禁其浮靡，抑其兼併。遇有水旱疾疫，則開倉廩，悉府庫以賑之。如是而已，是亦君相調劑之法也。要之治平之久，天地不能不生人，而天地之所以養人者，原不過此數也。」

洪亮吉生當乾隆嘉慶之交。他那時看到天下太平已久，人口繁殖，生產不增，物價昂貴。乾隆窮奢極欲，一味浪費。已種下道光咸同時代蓋次農民革命起義的因子。他看到這幅遠景，才做了治平那篇文章。他的結論說道：「此吾之所為治平之民慮也。」很有不勝感慨以之的樣子。

洪亮吉的「意言」，寫在乾隆五十八年，即公曆一七九四年，要比馬爾薩斯人口論的第一版早四年。照著作前後而命名，馬爾薩斯人口論應改稱為洪亮吉人口論。張蔭麟於一九二六年在「東方雜誌」上，介紹過洪亮吉的學說。日本人飯田茂三在他所著「支那人問題」(一九三四年出版)一書裏也引用了他。洪亮吉沒有用幾何級數這一名稱，雖然幾何學從明末已經傳入中國了。

人口生殖的速度祇有在某種條件下，方能依照幾何級數的等比級數而增進。這在世界各國歷史上很難舉到實例。但在馬爾薩斯以前一百多年，明朝徐光啓却已指出明朝宗室人口的增進，是依照幾何級數的。十四世紀中葉(一三六八年)朱元璋統一天下以後，把他兒子封王建藩，世世享有宗祿，可以不用勞而獲。這制度沿用到明末。從洪武一直到萬曆甲辰(一六〇四年)，二百餘年間，宗室人數增加了一千零七十倍。徐光啓處置宗祿，查核邊餉的奏議裏邊，曾列舉數字。我們從此可以知道，明朝親郡王男女的數目，在洪武中是五十八人，到永樂時，為一百二十七人。隆慶初(一五六七年)增到二萬八千人。萬曆甲辰(一六〇四年)再增到六萬二千人。照徐光啓的估計，各時期統是每三十年增加一倍。但按照實際數字計算，平均每二十二二年即可增加一倍，比馬爾薩斯所假定每二十五年增加一倍還要快。朱元璋創造這制度，原要剝削老百姓，來維持他一家子孫帝王萬世之業。到後來這筆宗祿，成為國庫極大負擔，

使國防邊餉都無着落。明朝的亡國，宗祿是重要原因之一。

英國下爾桑特所著「世界人口論」(一九三六年出版)一書裏曾經指出：中國人口和歐洲人口一樣，在十七世紀以後，有突飛猛進的現象，所不同者：中國人口增進的加速，在十七世紀的後半期即已開始，歐洲人口的增加則到十八世紀初葉以後方才顯著。中國歷史上的人口統計數字雖不十分可靠，但增減緩急的趨勢，大致是正確的。據歷朝自漢迄清的記載，中國人口為一萬四千三百萬人。到一七九三年(乾隆五十七年)，一躍而為三萬一千三百萬人。五十二年(乾隆五十八年)，正是人口壓力膨脹得很高的時候。十九世紀中國人口雖仍有增進，但遠不及十八世紀後半葉的迅速了。相反地，歐洲的人口從馬爾薩斯人口論出版以後，依然激增，使十九世紀成為歷史上歐西人口增加最迅速的一個時期。

洪亮吉的人口論和馬爾薩斯人口論，一樣地有他的時代背景。但從現在看起來，洪亮吉那是在太平之世，滿目時艱，好像已經見到道光以後，戶窮財盡所引起的一連串農民革命，可稱為有先見之明。在歐洲方面，十九世紀經濟的發展，人口的驟增，却使馬爾薩斯的理論，成為無的放矢。這其間的區別，乃是由于十九世紀歐洲近代科學的勃興，使農業工業生產大大地增加。馬爾薩斯人口論之不能適用於十九世紀的歐洲，恩格斯早已于一八四三年所著論文中指出了。他說：

「科學的進步，是無限的。他至少和人口的增進一樣快。在這一世紀裏(十九世紀)農業科學是如何迅速地進展着，而這進步幾乎單靠了化學這一科，尤其是靠了英國的台維斯和德國的利比克兩人在化學上的成就。所以科學的增加，至少和人口一樣快。人口的增進要看前一代的人數，而科學的進步，要看前一代所傳下的知識總和。所以科學的增進，也是依照幾何級數的。科學發展的前途，不是無限的嗎？」

恩格斯這種高瞻遠矚的見解，已經近百年來科學飛速的進步所証實了。馬爾薩斯人口論，在科學昌明的國家也早已破產了。但是帝國主義國家的作家們，仍有不少歪曲馬爾薩斯人口論，來作侵略的工具。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德國的白那提將軍出版了一本書，名為「日耳曼與第二次戰爭」，書中赤裸裸地主張侵略。他說德意志等民族人口已經增加到一定限度，使佔領和奪取鄰邦的土地，成為不可避免的途徑。在一八一八事變的先後，日本作家不絕地鼓吹，說日本人口每年要增進一百萬人。日本本土已經無處立足，如若日本要移民的話，每天就得要有三千人從日本出口，別的國家統走不通，只有中國的東北，才是他們的理想所在。結果日本人把東北搶奪了去。從一九一八到第二次大戰結束，十五年中，日本帝國主義的本來面目完全暴露了。他們在東北，開闢了不少煤和鐵，掠奪了不少糧食，斬伐了不少森林，並不能移殖多少人口，只是奪取土地，榨取資源，以預備作更廣泛的侵略而已。

德日帝國主義已經打倒了。從前這種強橫霸道的人口論，該應消聲絕跡了。可是近來英美帝國主義國家，若干學者的口論，仍然不免有煽動性，暗地裏製造戰爭，阻礙和平。美國芝加哥大學國際法律學教授昆西賴志，在他近著「人口趨勢與國際關係」這篇文章裏說：

「人口是軍事潛力的一個因子。兩個鄰邦人口增加率的不平衡，會干擾到兩國均勢。在帝國主義侵略戰爭時，人口增加最快的國家，就是甘心去做戎首的國家；在勢均力敵兩個國家集團陣容的戰爭時，則人口增加得慢的那一方，便要受發制人那一方。」

大西洋公約和美國的馬歇爾計劃已使資本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陣容的對立，壁壘森嚴地很明顯了。資本主義國家的學者們，又在注意到兩個集團的人口增進趨勢了。英國著名科學週刊「自然」在其一九四九年二月五日出版的一期的社論裏，已提醒英美的軍事家、政治家們注意一件事，即是「如眼前歐洲各國人口增加的趨勢延續下去，則二十年之後，歐洲西方國家能荷戈的壯丁，將減少五百萬人，而蘇聯應徵軍役的青年，要增加一千三百萬人。」這是多麼能發動戰爭販子們要求速戰的心理的一句話。美國普靈斯頓大學人口研究室主任羅志斯且茵在他所著「西歐與蘇聯人口的基本變動」這篇文章裏也指出在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七〇年期間蘇聯的人口，將從二萬萬人增加到二萬五千一百萬人。但西歐與中歐的人口，將從二億三千七百萬降到二億二千五百萬人。這類數字，在英美的軍事家看來，一定是以為驚心動魄的。

但是人生下來不是來當炮灰的。正如發明原子能，不是要來轟炸婦孺，而是要來開運河、平邱陵、為人民造福的。百年以前，恩格斯已經指出近代科學的進步，必能使生產的增加，超過人口的增加。這理論在一九四九年八月申到九月初，聯合國在成功湖所召集的一個資源利用科學會議裏，又得到一次證實

為什麼要先打好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

茅冥家

一、問題的提出

中國的現階段是實行新民主主義。雖然中國將來無疑要走向社會主義，但在人民政協制定共同綱領時，沒有把中國社會主義的前途寫進去。為什麼不寫進去？是因為「要在中國採取相當嚴重的社會主義的步驟，還是相當長久的將來，如在共同綱領上寫上這一個目標，很容易混淆我們在今天所要採取的實際步驟。」（劉少奇：中國人民政協第一屆會議席上講詞）從新民主主義

了。這次資源利用科學會議裏，到了六百多位自然科學家和經濟學家，讀了數百篇關於世界資源的論文，使大家充滿了樂觀的情緒。因為大家知道，世界上人們認為必需物品，只要分配得當，很少是不能普遍地滿足人們慾望的。單以糧食而論，由於農業技術的科學化，每年每個農夫的生產量，平均已能增進到百分之五，而世界人口的增進的速度，每年平均却只百分之二。除糧食而外的其他重要資源，據人口專家估計，如用最新科學方法採取、製造、保存、和使用，亦足够世界人類長期的取給。即如煤油一項為資本主義國家所欲巧取豪奪的重要礦產，依美國專家李福生的估計，世界各大陸及淺海中水成岩所含油量未經開發者，共量等于目前全球每年煤油消耗量的五百倍。（會議簡報見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美國科學週刊）。

但帝國主義國家的戰爭販子，却仍然叫嚷着世界人口過剩和資源乏絕的口號。美國泛美協會資源部主任威廉福志在所著「生存之路」（一九四八年出版）書裏說，美國的人口已經太多，煤油已將乏絕，不得不取給于近東，如蘇聯阻撓，不惜出之於一戰。這種瘋狂論調之不合理，已由蘇聯文學家法捷耶夫在去年四月間巴黎和平大會上公開指出了。對於中國人口問題，威廉福志從馬爾薩斯理論推演得到這樣的結論，他說：「目前中國最大的悲劇，將是（因衛生進步）全國死亡率的普遍降低。」又說：「從世界眼光看來，中國各地大規模的水旱災荒，不但是應該有的，而且是必須有的。」這種荒謬言論竟敢為我們，近代科學不但延長了人生的壽命，不但增加了農工業的生產，不但減免了水旱災荒，而且把馬爾薩斯的人口論也推翻了。近代科學是很好的工具，最重要的是我們不要利用他來製造戰爭，互相殘殺，全世界人類應該同心協力地利用科學，來和疾病、災荒、愚毒、貧困奮鬥，以建立永久的和平。

走進社會主義，還相差一個歷史階段，新民主主義社會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廢墟上建立起來的，是從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到社會主義社會的過渡。歷史條件賦予它底經濟結構，不能實行像社會主義的生產資料為全社會所公有，所以共同綱領規定了中國新民主主義的社會經濟是包含了五種經濟成分，即：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農民與手工業個體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和國家資本主義經濟。

但五種經濟成分中的國營經濟，是從沒收官僚資本及新興的國有資源和

大企業而由人民自己來經營的國家財產，亦即全體人民的公共財產，按其性質來講，是社會主義的，所以共同綱領又明確規定「國營經濟為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在新民主主義的國家中是作為「發展生產、繁榮經濟的主要物質基礎和整個社會經濟的領導力量」（第二十八條）。共同綱領之所以不寫進社會主義的目標，而却在經濟結構中要以社會主義性質經濟作為主導力量，這是有理由的。簡單的意思，就是因為新民主主義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的過渡，要使落後的半封建半殖民地變為進步的社會主義國家，即把落後的農業國家逐步地變為進步的工業國家，就是要在未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以前，先打好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先具備了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條件。一九四九年二月一日出版的「爭取持久和平，爭取人民民主」上的社論「新民主主義國家建立社會主義經濟」一文中，已經為我們指出了新民主主義國家在自身發展條件上，有建立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作為進入未來社會主義基礎的必要。不這樣，不先打好基礎，未來的社會主義就達不到。本文所要說者，就是為什麼必定要這樣。

二、基本論點

我們說必定要這樣，是因為一切社會制度、政治組織等等，是安放在物質基礎（經濟條件）上面的。所謂「物質基礎」，具體地說：就是物質資料底生產方式，是決定社會制度、性質底主要力量。對於這樣的力量，斯大林解釋得最清楚，他說：

「據歷史唯物主義看來，便是人們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資料謀得方式，便是社會生活和發展所必需的食品、衣服、靴鞋、住房、燃料和生產工具等物質資料生產方式。」（關於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

由於在共同綱領經濟政策中，是規定着由國營經濟為領導，而國營經濟是屬於「有關係國家經濟命脈和操縱國民生計的事業」（第廿八條）。所以國營經濟是直接關係人們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直接影響着物質資料謀得方式或生產方式的。現在國營經濟既明確地規定着為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所以經濟綱領中的主導力量，就可以作為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作為達到發展生產、繁榮經濟以建立進入社會主義的生活資料與生產方式的主要物質基礎。

曾有一個故事，說：

有一個美國教授到蘇聯問一個小學生，他說：有一個人拿了三元錢買東西，再將買來的東西以五元錢的代價賣出去，問這個人得到了什麼？小學生回答說：他得到了三個月監禁。

從這樣一個極微小的故事中，我們得到了一個無限幽默的基本上底分界線：一個資本主義制度的代表者與一個社會主義制度的代表者。

這是「人們底社會存在決定人們底意識」。（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這個美國教授底存在底社會，是資本主義的社會，存在於資本主義社會底人們，主要的意識底產生，本質上是由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極端不合理的生產關

係所決定的。那個蘇聯小學生底存在底社會，是社會主義的社會，存在於社會主義社會底人們，主要的意識底產生，本質上是由社會主義社會的社會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生產關係所決定的，他們知道他們應該怎樣的來為整個勞動羣眾及社會人民服務。從這裏，我們就可瞭解決定於人們的意識、觀念形態底形成，完全是以社會底物質條件為基礎的。所以斯大林說：

「社會底精神生活藉以形成的來源，社會觀念、社會理論、政治觀點、政治制度藉以產生的來源，不是要到觀念、理論、觀點、政治制度本身去尋找，而是要到社會底物質生活條件中，社會存在中去尋找，因為這些觀念、理論、觀點等等，乃是這社會存在之反映。」（關於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列寧主義問題，見莫斯科外文局中文本）。

這裏所謂社會觀念、社會理論、政治觀點、政治制度等等，具體地說，就是指人們底國家制度、法權觀點以及文藝、哲學與宗教等。恩格斯指明馬克思對本問題的解釋說：

「人首先應該飲、食、衣、住——在他們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等之前，所以直接的物質的生存資料的生產以及某一人民或某一時底經濟發展底特定的階段組成一種基礎，從這基礎上發展了特定的人們底國家制度、法權觀點、藝術甚至宗教觀念；因之，它們應從這上面來解釋。」（馬恩全集卷十五）

這些觀念、制度等等，馬克思稱為社會的「上層建築」。社會的上層建築底領域，是很豐富而又是很複雜的。在具體內容上包括着政治制度、憲法、法權、科學理論與機關，以及人們的藝術活動（文學、繪畫、戲劇等）、道德、宗教信仰等。上層建築安放在社會底經濟基礎上面，而前者是跟着後者變的。

「在社會底經濟基礎上建築着上層建築底整個體系：政治制度、法權、科學、藝術、哲學、宗教、倫理學等等。」

有什麼樣的社會基礎，有什麼樣的社會物質基礎，就應該有什麼樣的社會上層建築。經濟基礎變了，上層建築（政治制度等）亦就變了。（尤參：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馬克思主義旗幟」一九三九年第九號，根據一九五〇年一月新華版博古譯文）

但在如此豐富與如此複雜的上層建築中，首先被經濟基礎所決定的，是政治制度，就是國家：

「在經濟基礎上安置着上層建築。最接近經濟基礎的是政治的上層建築，社會底政治制度就是國家。政治制度為生產底經濟條件所決定，在歷史上還不會有過這樣的情形：即生產手段屬於一個階級，而政權屬於另一個階級。」（同上）

由此可見，要有人有社會主義觀念、意識，必先要在可能產生社會主義社會的物質條件中總可能有，而要實行社會主義的政治制度，就先安放在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經濟條件）上才有社會主義的實際。空想的社會主義與科學的社會主義的設計底主要分別就在這裏。

但這並不是說，意識完全是消極的、依賴的，並不是說政治制度絲毫不會影響於經濟基礎的，這樣我們便會陷入「經濟唯物論」者和孟什維克的錯誤了；恰恰相反，政治制度同樣是影響着經濟基礎的。我們是歷史唯物論者，我們

只認為物質的存在是第一性的現象，而意識是第二性的、派生的，但却不是完全消極的、依賴的。我們要確定它們在發展中的相對的獨立性，馬克思主義者絲毫不會忘掉這一點：即意識本身被決定發展中的具體相對的獨立性，但在相對獨立性中承認社會發展的決定力量是物質基礎。前者是絲毫不會動搖後者的基本論點。恩格斯說：

「經濟運動一般地自己開闢道路，但是它同樣受到從政治運動來的反作用，政治運動是經濟運動為自己創造的，而它具有相對的獨立性。」（馬恩通信集）

馬克思主義正是這樣的教導我們：經濟基礎決定了上層建築，但當上層建築一經產生後便反轉來影響基礎。社會主義社會是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經濟條件）為自己創造的，它們本身具有着發展中的相對的獨立性，依據這個觀點，先進理論的意義在這裏發生力量了。因此，馬克思主義者自己認定：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乃是社會發展的結果，只能產生在工人階級出現之後；馬列主義思想一掌握工人階級的意識之後，就立刻成了偉大的物質力量。

但這裏，我們只是說，先進的革命理論的產生，在歷史中的偉大的作用，這個作用，是物質的力量，特別是在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中達到最尖銳的時候，達到巨大的革命行動來到的時候，先進理論表現在這裏有特別的意義。因為作為先進理論之為先進理論，是從物質生活底條件中出現的，因為存在永遠是第一性的。

總結我們的觀點：凡是在底社會，都應該有經濟基礎的，一切上層建築，特別是最接近經濟基礎的政治制度，是安放在基礎上面的，沒有社會經濟基礎底社會，所有社會底政治制度的設想都是空的。所以為託邦終究是烏託邦，小戴禮記的轉運大同篇、康有為的大同書，終都是理想，沒有實際。怎樣從空想的社會主義找到科學的社會主義，主要的是怎樣在把社會的制度，先從經濟上面打好基礎，就是說先要從物質資料底生產方式走過去。

三、蘇聯的建設物質基礎階段

我們現在先來看蘇聯：

蘇聯由舊俄時期走到現在社會主義的社會，是經過一番建設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這一時期的。在蘇聯，一九一七年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後，到戰前斯大林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完成，就相當於建立蘇聯社會主義社會的物質基礎時期，因為這一時期雖然已推翻了資產階級底統治，無產階級奪得了政權，但還是相當不理想的，因為這個社會的產生，還帶着許多舊社會的東西，還不是純粹的社會主義社會：

「我們這裏所碰到的不是在自己本身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共產主義社會，相反的是那個剛從資本主義社會中走出來和因此在此一切關係上，在經濟上的、道德上的和智慧上的關係上，都還保存着它所從由而來的舊社會底生來的污點的共產主義社會。」（哥達綱領批判·馬恩全集卷二）

因為完全的社會主義底建成，是不能一蹴而就的，要進入社會主義的社會，勢必有在政治與經濟上的全盤的改造時期，使舊社會帶來的污點全部肅清。所以在這一時期中，無產階級取得了國家政權後，首先就把生產資料變為國有財產，掌握了國內的經濟命脈，大工業、銀行、運輸業等和土地收歸國有，徹底剝奪資產階級經濟統治的基礎，並從而創立了按照社會主義原則來改造和重建全部國民經濟，打下了進入社會主義的卓絕底物質基礎，並以此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鞏固工農聯盟，保證社會主義的建成。列寧說：

「無產階級專政底目的，是要創造社會主義社會，消滅社會劃分為各階級的現象，使社會底一切分子統統變成勞動者，剷除任何剝削人的基礎。這個目的不能一下子實現出來，而需要經過由資本主義走向社會主義的長久的過渡時期——這也因為改造生產是一件困難的事情，這也因為需要充分時間來根本改革各方面的實際生活。」（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

這一個過渡時期一定是長期的，因為舊的統治階級要鎮壓，外來的侵略要抵抗，經濟要全盤地改造；還有廣大的分散的農民要組織他們，領導他們，因為在過渡時期，不把落後的農業國變為工業國，就不能鞏固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就不能正式踏上社會主義之路，這一切，都是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以前的條件。

最主要的，足以決定並保證社會主義社會的建成的，即是在聯共（布）十六次代表會議批准的第一個五年計劃。五年計劃的基本任務是要在國內創立這樣一種工業：能够在社會主義基礎上重新武裝和改造整個工業、運輸業和農業；並把散漫細小的個體農業移到巨大集體的農業軌道上去，使最終排除資本主義份子，並為社會主義社會奠定經濟基礎。蘇聯就在第一個五年計劃完成後，正式建成了社會主義的國家。

在四年○三個月過程中，蘇聯人民用自己的力量，建立了世界著名的瑪格尼托科爾斯克和庫茲涅茨的冶金聯合廠；斯大林格勒和哈爾科夫的拖拉機製造廠；羅斯托夫的龐大的農業機器製造廠；別列茲尼科夫斯基、索里加斯和西北比諾什爾斯基等地的化學聯合廠；歐洲最大的汽車工廠：莫斯科斯大林工廠和高爾基城的莫洛托夫工廠；以列寧命名的德涅普爾水電站，還建成了一千五百個最新技術裝備的工業底企業，改革並擴大舊有的工廠和製造廠，而且在歷史史上不曾有的，在從前工業最薄弱甚至完全沒有工業的地方：烏拉爾、西伯利亞、卡查赫、窩瓦河流域等地，也出現了數十個至於數百個新的企業。在四年○三個月過程中，農業上的發展的巨大也是驚人的。零散的小農經濟，已走上了集體經濟底道路，蘇聯農村從社會主義工業中，領導了數十萬新的農業機器，到一九三二年——五年計劃的第四年——在農業中的拖拉機的數量已達到了十四萬八千具，組織了集體農莊已有二十多萬個，國營農莊有五萬個，機器拖拉機也將近二千五百個，加入了集體農莊的農民已達到三千萬以上。

這巨大的成就，確是歷史上未曾有的。

因此，幸福底蘇聯，就在這偉大的五年計劃底基礎上，建立了社會主義社會，消滅了剝削階級與被剝削階級底劃分，消滅了人剝削人的現象。斯大林在總結第一個五年計劃時，鄭重地說明勝利的成果，他說：

「五年計劃底總結已經表明：在一個國家里建成社會主義社會是完全可能的，因為這社會底經濟基礎已經在蘇聯建成了。」（一九三三年一月七日總新報第八節，「列寧主義問題」）

由於社會主義社會底經濟基礎的建成，所以在蘇聯社會主義社會的建成成為可能。全世界聞名的「斯大林憲法」，就在這個基礎上產生的。斯大林說：這個憲法，是把已經爭得的勝利的事實，登記起來，和用立法手續固定起來。它是社會主義社會建成底標幟。所以說，現在蘇聯社會主義國家的獲得，也會經過一番打好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底階段的。

四、在中國的條件下底物質基礎

人類社會的發展，按照歷史唯物論的發展底規律，說明中國和蘇聯及其他國家都沒有兩樣。中國的社會發展同樣要向社會主義的路上走的，中國的前途要走向社會主義，也要穩步地變落后的農業國為工業國，也要為將來的社會主義先打好物質基礎。

但中國有一個特殊底歷史條件，這個歷史條件規定中國革命的新的性質。中國沒有發展過資本主義。自鴉片戰爭起，帝國主義勢力的侵入，中國就開始是半殖民地社會，中國的工人階級是在帝國主義勢力下的半殖民地社會中產生的，由於中國自身沒有具備過產生資本主義的條件，所以半封建與半殖民地的社會形成底結果，出現買辦官僚的金融資本來崩解了這個社會。顯而易見的，在中國，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在十九世紀末葉就已開始發生，但為什麼五六十幾年來還不能擺脫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狀態，而獨立發展為資本主義社會呢？這是因為帝國主義經濟的控制，只有透過中國本身社會經濟關係的殖民地化與買辦化才得實現，因之舊的封建勢力在這里就佔有了新的地位。孫中山雖然推翻了滿清帝制，但他的革命却依然沒有成功，因為他所領導的革命的果實，在他死了以後被封建、官僚、買辦的集中代表人蔣介石所竊奪奪去了。蔣介石統治中國二十二年來完全背叛了革命，不僅沒有把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狀態打破，相反的把中國弄得更加更殖民地化，把中國拖到了絕境！把中國革命的天阻擋了二十餘年！孫中山主張節制資本，而蔣介石不但把私人資本節制，相反的擴大着掠奪人民的財富，變為其四大家族的私有資本；孫中山主張平均地權，讓「耕者有其田」，而蔣介石不但把土地平均分給農民，反而還剝奪了農民的土地所有制，讓地主來霸佔，作為壓迫農民的工具。當然，蔣介石就是封建地主以及洋奴買辦的集中代表人，他當然不肯去實行孫中山的主張。因為他知道：如果真正實行孫中山的經濟政策——節制資本、平均地權，那末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就漸漸失去了它的依靠，因為蔣介石對於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無異是附贅懸瘤與決疣潰癰，如果中國社會早一天結束了半封建半殖

民地狀態，就使蔣介石壓迫的對象落了空，蔣介石本身就無所代表，那末作為蔣介石的靠山就不能存在！這在蔣介石當然是辦不到的，所以蔣介石不願意實行孫中山的主張，他懼怕着中國向着社會主義路上走，懼怕着進步的工人學生運動像排山倒海的浪潮把他從獨裁的寶座上摔下來，懼怕社會的物質生產力與社會關係的矛盾而動搖並影響小皇朝的根基，因之代表買辦法西斯的政權更瘋狂地榨取人民的財富，大官僚大地主的金融資本更具有獨佔性與壟斷性，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歷史階段底資本掠奪已到了頂點，已與帝國主義同樣的進入到寄生、腐化的垂死的時期。就在這時，人民的革命就強迫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讓位給新民主主義社會，舊的腐朽的社會關係為新的合理的社會關係所代替。現在，在人民面前，代表封建地主買辦法西斯的蔣介石政權已被基本地打倒了，代之而起的是新民主主義的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就是說現在已進入了新民主主義的社會。上文說中國有一個特殊底歷史條件，新民主主義社會就是這個特殊底歷史條件下的產物。

但因為我們中國的社會，不是已經經過了工業化了的社會，若干地處還停留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狀態之中，中國現在的基本任務是：要徹底掃除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殘餘，因為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殘餘是發展社會的物質生產力即發展正當的民族資本主義的障礙，所以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性質，基本上還是新的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是一種徹底的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但中國發展資本主義（不是官僚資本主義，主要的是指國家工業化）的結果，不是向歐美沒落的資本主義的路上走，劉少奇副主席老早講過，中國工業的結果，如走向帝國主義，那將是中國人民及全世界人民之所絕對不容許的！在目前世界資本主義正走向崩潰時期，中國是無論怎樣不容許的！在目前世界資本主義中國工業化的結果，只有一條路：走向社會主義。所以中國的工業化，是為社會主義社會創造前提，是為社會主義社會建設基礎，所以新民主主義的性質，不僅是新的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同時也是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由於這兩個基本任務，所以我們要走上社會主義社會，比歐美資本主義國家，更需先打好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的物質基礎。

在這一點，我們和蘇聯的社會主義的革命有許多地方是近似的，因為蘇聯在社會主義革命以前也是相當落后的國家（但中國更落后，蘇聯的落后是在帝俄時期是一個落后的資本主義國家），我們現在也要和蘇聯這樣，先把國家工業化起來，然後漸漸使農業也走上集體化之路。現在東南歐的新民主主義國家，也都走着這一條路。這一條路是通向社會主義道路的多樣形式中的共同底總的道路。費古爾諾夫在論歐洲人民民主國家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時說：

「人民民主國家的走向社會主義道路這個發展的特點，這並不是意味著對於他們有另外一條通往社會主義的道路底存在。人民民主國家所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只是偉大的蘇聯為了全人類所開拓的一條根本的總的道路底多樣形式而已。」（原文刊二十期布爾什維克雜誌，照齊恩翻譯，時代三二〇期）

顯然的，人民民主國家所走的到達社會主義的路，和蘇聯是同一條的，山

于中國的歷史條件的不同，不過是同一條路的多樣形式當底一種形式而已。在發展的條件下，人民民主國家的主要經濟成分就帶有鮮明的社會主義性質，去年二月一日「爭取持久和平、爭取人民民主」的社論中也指出：

「新民主主義國家的經濟恢復是以經濟的各個主要部門之國有化為基礎，並使較消費品的生產更多。工業與農業的關係現已發生變化，這一事實便說明了若干落後的農業國家正在逐步轉變為工業發展的國家。這一切都加強了使新民主國家的獨立，同時也具備了以社會主義經濟為基礎的迅速發展的先決條件。」（照版大中蘇友協「友誼」五卷六期整版譯文）

所以，我們在共同綱領規定的五種經濟成份，由國營經濟為領導，是要「有計劃地有步驟地恢復和發展重工業為重點，例如礦業、鋼鐵業、動力工業、機器製造業、電器工業和主要化學工業等」，同時還要「恢復和增強紡織業及其他有利於國計民生的輕工業生產」（三十五條），使之達到「發展生產、繁榮經濟」的目的，這是我們工業化的初步。農業方面以鼓勵扶助廣大勞動人民根據自願原則，導引他們向合作社經濟發展，「在城鎮中和鄉村中組織供銷合作社、消費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生產合作社和運輸合作社」（三十八條），漸漸使個體生產進入集體生產，土改已徹底實現的老區固然要這樣做，新區的土改實現時也逐步地按照實際情況配合發展，這是農業集體化的初步。這些都是

中學國文教學的研討

張雲橫

「觀察」六卷七期載有王泗原先生「新的中學國語課本該怎樣編」的一篇文章，討論中學國文課本應怎樣編選的問題，並擬定編選中學國文課本的原則和大概內容；六卷十期上復載有陳治文先生「論中學國文課本」一文對王泗原先生的意見有所辯正。中學國文教學如果能有一本良好的比較接近理想的課本，這是適應當前的需要，而且也是我們大家所歡迎的，因為這部份解決了中學國文應該教些什麼的問題，使中學國文教員至少能夠得有所依據。但更重要的是，我覺得倒還是我們應該更加重視中學國文應該怎樣教，應該怎樣來提高國文教學的成績和水平，應該怎樣來達成國文教學的目的，收到國文教學的預期的效果的問題。因為有一本完善的國文教本，固然能使國文教學得到很多的便利，但是國文教員在實際教學的範圍以內，還是有其充分的變通和運用的權利的。這就是說，如果沒有一本比較良好的國文課本，而祇要國文教員對於國文教學能有相當的認識，對於國文教材能有相當判斷的能力，他還是能夠設計出補充的辦法的；而且即使我們有了一本完善的課本，我們也不是從頭至尾地死課本讀完一遍就算完事的。因為儘管這本教本是如的良好而接近理想，但充

在未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以前，所要實行的社會主義的經濟條件，也就是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所以中國社會採取相當嚴重的社會主義步驟，在條件上不如資本主義發展得很高的國家那麼快，必須要等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打好了後，就是說等中國現在所實行的社會經濟發展得具備了可以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的實際條件，或有進入社會主義實際需要的時候，中國才可以採取社會主義的步驟，以符合人民的要求。所以劉少奇副主席又明白的指出：「在中國採取社會主義的步驟，必須根據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實際需要和全國大多數人民的要求」，所以在共同綱領規定中國由農業國變工業國，是要「穩步地」去變，不可「一蹴而幾」的。

哲學唯物論的論點：在發展過程中，內容先於形式，形式落後於內容。在歷史社會的發展中，我們把物質基礎、經濟條件稱之為內容；則屬於上層建築的政治制度、法權觀點、科學理論以及文藝活動、宗教形態等等以及諸如此類的現象，我們就稱之為形式。

「內容底發展，先於形式底產生和發展。」（勃里亞：關於外高加索布爾什維克組織史問題）

因此，只有現在先打好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才能使未來的中國「科學地走上社會主義社會：否則只是「空想」，沒有「實際」。

一九五〇年三月二十八日於瀋陽北陵·第三次改定。

其量寥寥數十篇，其內容也還是不夠的。如果沒有課本以外的補充教材和配合課本的參考資料的幫助，對於學生的思想教育和國文程度也還是不能充分貫徹和適當提高的。所以我們這裏提出了國文教學的方向、內容和方法的問題，希望引起大家的注意，將催發大家提供意見和相互研討的興趣，這裏不過是我個人提出的初步的擬議。

現在我要先提出和國文教學有關的二個問題，第一個是文言文（古文）和白話文的取捨問題，第二個就是國文教學和思想教育的相互關係問題。

先談文言文和白話文的取捨問題，過去這個問題是一直在熱烈地論爭着的，現在應該是差不多已經到了可以澈底澄清不容再存有任何疑問的時候了。王泗原先生在「新的中學國語課本該怎樣編」一文中，也曾着重地提出這個問題。他的結論以為「必須確切認定：一、古文今日必須廢除，古書只該讓那極少數研究古代學術的專家去讀，中學生不該讀，這是就理論說。二、古書絕不是中學生所能讀解，古文絕不是中學生所能寫作，這是就事實說。」雖然後來陳治文先生對這問題提出相反的意思，但我們仍舊覺得王先生的意見大致是

們這樣引導並指導學生自學，可以使同學們的國文程度因此得以提高，這也是很重要的事。當然，誠如王先生所說的：「中學國文是屬於語文的範圍」，這是主觀的，但是中學國文教學也不能完全不涉及文學的範圍。而且語文與文學的分野也是很難截然區別開來的。相反的，我認爲我們不但是要使同學們在中學時代，尤其在高中階段，打好本國語文的根柢，而且還要指示同學們以文學的初步知識，使同學們具有對文學的基本認識，並大體涉及今後人民文學的發展道路和正確方向。當然這不過是一般的普通的常識而不是什麼高深的專門的理論。陳先生在「論中學國文課本」一文中說：「那末要在什麼原則下來決定教材呢？無疑的，要在傳佈新民主主義的新文化的原則之下來決定。」此外如反對陳死的枯槁的教條主義的理論，注意與革命實踐及實際生活有關的題材，這也是中學國文教學所必須認識的原則和方向。

五

教死書，照字面解釋的傳統教學方式，是絕對不能再適用而且也是絕對不能滿足同學的要求了。如果我們專門從文字的表面來講解，是沒有意義的，多餘的，白話文同學們自己也是能看的，你又有什麼心得什麼幫助能給學生呢？所以課堂教學在講解方面，應該從兩方面來進行，在教材的大意方面，思想內容方面，應該是有重點有比較地提綱挈領地來進行；而在文章表現的形式方面，寫作技巧方面，則應該是有細到地委曲地來分析研究。

在補充教材方面，因爲教員每教一課書，必須要知道和每一課裏有關的各個問題，必須要參考各種書籍，這就是說教員應該要比同學在一課書裏知道更多的東西（包括各種資料）。而且我們每教一課書，不但自己要有參考材料，而且我們也必須要讓同學們也有相當的補充資料，或者叫他們自行搜集（限於普通的），或者幫助他們搜集。初中國文課，因爲同學們閱讀自學的能力較差，所以在補充教材方面，我認爲可以多多利用故事教學的方式，以相當的文學作品通過口講的方式來發揮它的教育性，並豐富同學的想像力，啓發他們的創造性。即使在高中部，我們如果能使同學有機會接觸名人的傳記，理解文學家

關於董時進上書反對土地改革問題

董時進君爲反對土地改革，曾上毛主席一信，並又印了到處散發。北京農業大學應廉耕、韓德章諸教授，曾在校內發動師生，舉行過幾次座談會。其中一次是有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所幾位老會員出席的。本文即係該次座談的發言摘要。

主席甲：董時進先生的文章，大家都見過了，所以現在不需要我來詳細介紹。概括地說來就是反對土地改革。他的根據是認爲：舊中國農村土地是「自由契約」的，兩個關係是

造性。即使在高中部，我們如果能使同學有機會接觸名人的傳記，理解文學家如高爾基魯迅等人的戰鬥性的人生，這也是很有意義而且很可以引人入勝的。填鴨式的教育，已經久爲人病，所以國文教學，除了講解偏面的注入而外，猶應指導學生集體討論，教員亦以一份子的身分參加意見，協助同學解決問題，歸納意見，得出結論。這樣經過同學們自己的分析討論，反覆研究，每篇文章的內容結構才能够在同學們的腦中留下深刻的印象，並引起作者和讀者思想上的融通和共鳴。

於此，我們得出一個結論，就是課內教學與課外教學（指導自學）應該同時進行，適當照顧。而課堂講解，又須注意課本內容、補充教材、集體討論三方面。在時間支配方面，不妨粗畧地確定爲各佔三分之一左右。這當然是可以有彈性的，但至少每教一書，先要經過分析講解，給予相當補充，經過集體討論三個步驟而後才算可以告一段落。但在練習寫作的時候，仍須注意配合回顧課本的題材、內容、表現方式和寫作技巧。（所以陳治文先生主張「寫好今文」「讀好古文」，把寫和讀分開來是不合理的）。

其他如實際觀察、深入調查、實際生活的體驗（理論和實踐的結合，如生產勞動等觀念的具體實現）等，都可以間接提供若干教學材料，都是可以提供注意和試行的具體辦法。總而言之，反對死教書，提倡活教育，注重啓發和培養創造性，從各方面來充實豐富教學的內容，這是國文教學和各科教學的共同原則。

王先生說的：「現在新中國誕生了，教育上必有新的計劃、新的原則。舊的內容制度，傳統的教學方式，現在都不適用了。和其他各界一樣，現在教育界也有一種革新的渴求進步的傾向，這是好現象。雖然現在新的一套還未確定，無論在教學制度方面，課程改革方面。一切還只開了個頭，一切猶待大家的開發和努力，改革舊系統創造新經驗，大家提供意見、交換心得、互相研究、集體商榷，相信一切困難都是可以克服的。」

一種「自由契約」，所以它不是封建性質的土地制度，因此，就不應該進行土地改革。爲了反對土地改革，董時進先生東檢西覓地找了一些理由，如什麼土地改革把土地分散了經營不便，什麼地主都是勤儉起來，農民都是游手好閒，分得土地必然荒蕪等等，來支持他的錯誤思想。

當這個腐爛了的土地主階級，將被從他們封建資產階級上拉下來的時候，自然要拚死掙扎的。董時進的上書，就是這種掙扎的呼聲，裏面有恐嚇、有詭辯、有哀鳴、有欺騙，

總之應有盡有，歸納到底還是一個，請毛主席恩賜恩典，不要進行土地改革。因此，對這種地主哀鳴，根本是不值一駁的。但是爲了避免一些善良的、有正義感的人士，爲其欺騙所影響，我們應該很好地加以研究、批判，把它比人民面前赤裸裸地揭露開來，今天邀請諸位來此座談，就是這個意思。

發言者乙：他這個思想完全站在地主立場上，否認封建剝削，反對土地改革。

發言者丙：

我和董時進先生很早就認識，我們農業經濟研究會同人們，在中國農村土地問題上，已爭論了多年。我們認為一個學農的人，首先考慮的應該是農村生產力發展的問題，因此，就必然的會考慮到舊中國封建的土地制度，對農村生產力發展的束縛問題。由這個觀點出發，唯一的結論就是土地改革。但是奇怪得很，學農的董時進先生，却閉口不談農村生產力發展的問題，這使得我們不得不感覺到董時進先生是在有意的逃避真理，為地主階級進行辯護。

本來董時進的錯誤思想是不值一駁的，同時由我們之間長期的思想鬥爭中，我深信董時進是不可能教育過來的。但是，由於具有這種思想的不僅是他一個人，而是有相當的一部份人，所以我們必須對這種思想進行尖銳的鬥爭。在我個人來說，過去在國民黨統治下，不敢公開地、痛快地來談這個問題。現在是人民的天下了，使我能夠痛快暢談，感禱愉快。

首先他說什麼舊中國的農村土地是「自由買賣」的，租佃關係是一種「自由的契約」。因此，舊中國農村，並不存在封建性的土地制度。在這個問題上，我請問董先生，舊中國農村中是否有土地的自由買賣？是否有自由契約的租佃關係？據我所知道的，所謂「土地的自由買賣」是在農民交不起租、還不滿意高利貸的盤剝壓迫下，地主利用農村政權的力量，巧取豪奪地把土地「自由」的不等價的買到手裏，所謂「自由契約的租佃關係」是農民被迫地割地租及額外超經濟剝削（如典蓋房屋、農忙幫工、家庭雜活等等）而「簽訂自由契約」。董時進先生所說的「自由買賣」「自由契約」在舊中國農村中就是如此，就是赤裸裸的超經濟剝削，把這種超經濟剝削叫作「自由買賣」「自由契約」，而認為舊中國農村不存在封建性的土地剝削制度。我感覺到學農業經濟的董時進先生太缺乏普通的政治經濟學常識了。

正是由於董時進先生混淆了封建性剝削與資本主義剝削，所以他說既然農村地主的剝削要被消滅，為什麼城市房產剝削反而受到保護？這種有意的混淆，無非也是為他所代表的地主階級辯護而已。

董時進先生好像也關心農業生產似的，說什麼「土地改革把土地分散了，經營不利」。其實我們也難怪董時進先生，因為他坐在上海的洋樓上，的確是難以了解農村的情況。據我在農村裏看到的足地土地分散租佃給佃農，一個佃農往往佃種着七八地分散的土地，而土地以後土地反能得到適當集中地分配給農民，在經營上比較方便

發言者丁：

得多了，加以農民得到土地以後，生產情緒高漲，生產力自然發展起來。其實生產力的發展與否，倒不是董時進先生所關心的，他不過以此來為地主階級說話，反對土地改革而已。

董時進先生又好像是關心農業生產似的，說什麼「土地改革引起地主的破壞生產手段，豈不對生產不利」。就當作董時進先生是在關心農業生產吧，我們告訴他：請你不必「耽心」，農民群眾會自己起來制止地主的破壞的。

最後我感到的興趣的是董時進先生好像進步了，過去在國民黨統治下他與我們爭論中，始終是反對土地改革，主張地主土地私有權是神聖不可侵犯的，而在解放以後，却主張國家向地主收買土地分配給農民，居然放棄了地主佔有大量土地的私有權了。在這個問題上董時進先生的確是大大進了一步，因為他學會了策略上的靈活性，學會了在情況變化之後，如何替地主階級保住老本。

主席甲：

丙先生談得很對，我感到在國民黨統治時代，董時進為什麼不能接受丙先生的意見呢？部份的也是由於董時進受資產階級農村經濟的影響過深，而使他不能認識舊中國農村土地制度的封建性，自己封閉了受真理之門，而在腐爛的封建制度上去追求什麼技術改良。

至於他說土地改革後，由於失去了地主富農的累進負擔而國家稅收，受到損失。這一點董時進先生實在有些過于為國家而扼人憂天了。今天在土地改革後的農村，農民繳納公糧的熱情與地主富農在繳納公糧時的隱瞞、轉嫁、推諉、拖延，正是一個很好的對照。今天的中國是人民的中國。佔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農民已成為國家的主人。農民知道如何愛護自己的國家，農民不但是為自己的祖國熱情地繳納公糧。而且他們更知道如何揭露地主階級的虛情假意，更知道如何捍衛人民民主專政！

董時進先生忽然「進步」起來，也引起我一種奇特之感。他居然也唱起「為什麼不暫時不要進行土地政策，等將來再進一步走向社會主義」的老調來了。感謝董時進先生對社會主義的關切，不過我不明白的是「到底董先生是對社會主義感到興趣呢？還是對保留地主土地感興趣呢？」

發言者乙：

子，有的人向魯迅先生挑戰，是希望魯迅先生應戰的，他很懂得作爲一個魯迅先生的對手，將是對付他身價大大的提高。現在我們在與董時進的思想鬥爭的時候，不由我想起了這個指示。董時進抄襲了這種手法，竟向人民領袖毛主席上書，在董時進想來確實是很巧妙的。但是董時進沒有看清一個問題，那就是時代變了，在魯迅時代沒份分子會受到反動的國民黨統治階級掩護，而在今天時代要在人民的面前受到無情的揭露！

丙先生說得很對。董時進是從來不敢談農村生產力發展問題的。據我所知，全國十四億畝耕地中，已進行土地改革的佔六億畝，而在這六億畝土地上，農民爲了改善自己的生活，熱情地生產着，因而使得長期戰爭的創傷，出人意料地、迅速地得到補償，生產已接近于戰前水平。過去國民黨時期的農業工作者所感到困難的技術推廣工作，現在由於掌握土地的已經不是地主而是農民，因而使得此項工作得到順利的推行。農民爲自己生產着，當然他要想盡一切辦法來改進技術，以提高他自己的收穫。最近的了繁碩良好，一九四九年河北省想從該縣向外調濟一部，即遇到該縣農民留難，農民寶貴其優良品種，由此可見。因此河北省在要訂一九五〇年生產計劃時，就很有把握地規定了五年內將主要作物全部換成糧食的計劃。董時進說農民只是在分得土地以後暫時的情緒高漲一下，過了一個時期就會低落的。在這裏我附帶告訴董時進先生，上述的武安農民是在一九四六年分得的土地，距今已三年多了，這個三年多恐怕不能算作一個短暫的時間吧！董時進又說什麼把「動檢」的地主的土地，分給「懶散」的農民，土地必然荒蕪，什麼土地改革後誰也不愛土地啦，關於這個問題叫上述的事實來自已說話吧！我想在土地改革以前，確實是誰也不愛土地，地主睡在床上吸大煙，從來對土地如何增產是不聞不問的，農民又在人家的土地上勞動，當然誰也不愛這塊土地，但是農民分得土地以後，對自己的土地自然高度熱愛，這一點請董時進先生不必「爲農民過慮」了。最後我感到的遺憾是董時進先生還從上海飛路的洋房裏走出來，從周圍的地主小圈子中走出來，到老解放區、農民的天下裏來看看。毛主席說：「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請董時進先生引以爲戒。

發言者丙：

我去年曾到解放區高碑店農村看了一次，正值徵收公糧，農民們繳納公糧的熱情，深深使我感動，我對偉大的農民，認識上更具體了。希望董時進先生也來看看。

他來看也是沒用的，他一切都由地主立場出發，看到

進步的包袱

費孝通

有一位朋友和我說，他發現了一個「改進的規律」：以往是落後的，進步得愈快；以往已經相當進步的，不再進步，而且落後。他更很有意思的說，這是進步的矛盾律：你進一步，這動作本身就產生了阻止你再向前一步進行的力量。這力量也就發展到一定程度，就會使你退回來。這是一個「規律」。

我聽了覺得這說法太抽象，不容易明白。他又補充說：「進步也是個包袱，你明白不明白。進步的包袱是從你以進步中得來的，愈壓愈重，最後會把你壓倒。」我還是搖頭。他有點性急了：「你自己反省反省好了，我說這話是指你呀！」

這樣刺激我，當時真是不好過。但是我得感謝他，給他這樣一說，「進步的包袱」這個形象化的名詞常常在我腦中起伏。

讓我們打開這個包袱來看看吧：

第一件是「報功領賞」。在反動統治下，曾經起過進步作用的人，多多少少是受過壓迫的，甚至領教過特務的威脅、冒犯性命的危險的。這些都是事實。他們在革命事業上是盡過力的，有過「功」的。勝利之後，這「功」就變成了「進步的包袱」。——現在是自家的天下了，有「功」的，苦了這多年，總得照顧一下了。以往被反動統治迫得東走西跑，現在該有個安定的生活了。進一步的，「功」也比較大一些，就想領個「官職」，這才算不是白費了半生命，老來圖個好日子。

其苦不甘壓迫，要求解放，原是應當的事。而且中國人民百分之九十都是這樣幹的，要不然，革命也不會勝利了。論壓

迫，誰也比不過農民所受的那樣深。「血淚仇」裏所流出的都是農民日常體驗的事實。論賞，賞所給出來的糧食且不說，拋頭顱，天性命，成千萬萬，還不是農民佔絕大多數？論功行賞誰也不該超過他們。但是知識分子中的「進步分子」似乎很不容易這樣想。為什麼他們會覺得自己的「功勞」特別大呢？原因是在他們覺得農民革命是當然，而他們呢，却稱罕。稱罕在那裏呢？說穿了就是：「原是可以不革命的，現在居然革命了，不是稱罕麼？」

「骨子裏還是跨在人民脖子上的心理。說進步分子沒有「功」，那是不對的；可是這點「功」早就得到了「賞」了。以往受壓迫，現在有了自由，還不是最大的報酬？但是為了自視特殊，要求特殊報酬，那就是落後思想了。把這個落後思想檢出來在太陽裏晒一晒，真是十分醜惡。

第二件是「自足自滿」。中國社會要從封建專制的舊傳統中進入新的社會主義，必須經過一番脫胎換骨的過程。舊勢力深入每個人的思想習慣，不及時把它洗淨，這個根根還是會春風吹又生的。因此，凡是從舊社會裏生長出的，多多少少都帶着一番改造的工夫。但是進步的包袱却阻止着一部自以為進步的人進行這種改造。

「我還需要改造麼？我在你們沒有覺悟的時候已經覺悟的了，早已改造過了。」

「這些書，我早就看過了，還是在被禁止時，冒着險看的。現在看起來就沒有那時有勁。閉門造車，方有礙。你們沒有嚐着這種味，真可惜。」

「還不是那一套？我是過來人呀！」

他比別人先覺悟，先接觸進步的思想，那是不錯的。但是覺悟有程度，理論有

深淺，要是說現在已不再需要深入求精，那就對不了。當我們在反動統治下，蔣介石那樣獨裁，那樣腐敗，凡是有一點民主思想、民族觀念的人都會起來反抗的。在反抗這一件事上，可以說許多思想不太相同的人，一起革命。狹義的國家主義者，資產階級的民主個人主義者，都有反抗的可能，雖然他們是會動搖的。加上反動統治的盲目壓迫，可能偶然的對某些人打擊了一下，甚至可能因反動統治階級中內部的矛盾，引起了對弱的不滿，這些「可能不革命」的人也革命來了。在參加反對反動統治這一點上自然是為人民所歡迎的，甚至可以承認在革命事業上有了功的。但是却絕不是說這隊伍裏思想上是一致的，都是徹底革命的。如果認為凡是在勝利之前，同情過、參加過、參加過革命隊伍的人全是搞通了思想的，那就和事實不合了。

要建立新中國，要我們從新民主主義社會進入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這是個長期的過程，現在還是剛開步走。如果我們還存着封鎖、買辦、以及舊民主主義思想，即使現在用進步的包袱緊緊的綁着，不立刻鬆開，總有一天，會把我們拖住，上不上前的。那時候，不但我落後，而且會成爲反動分子了。

民主個人主義的思想在一般會談罷論爲進步分子中的確是很普遍的。這有它過去社會的根源。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又受過幾十年英美式的教育，如果說骨子裏沒有民主個人主義的思想，那才是怪事。當然，被奇理一號看這些思想在表面上是不容易暴露了，但是在具體問題的見解上，在其行動上，這種思想還是很有力的支配着這部分的人。我們不容忽視這事實，因爲試要這種思想存在着，還是會不自覺的被敵人利用的。

客觀上看這種思想在是事實，但並不是說，有這種思想的人最後必會成爲人民的敵人。因爲思想是可以改造的，主觀上是可以努力的。如果不斷的自我批評，把這些思想從包袱裏翻出來，見見太陽，暴露暴露，就有可能把它消滅了。如果緊緊的藏在包袱裏，那就危險了。這像個定期的炸彈，不擲出來是要毀滅自己，也要害人的。進步的包袱的危險，就在這裏。

第三件是「妒惡別人進步」。背上進步包袱的人時常有一種「排隊」心理。在他前面的就永遠在他前面，在他後面的也就永遠在他後面。他望着前面的隊伍，自己安慰自己說：「這是趕不上的。要着他們領導就得了。」爲什麼趕不上呢？理由也就多了：「我老了，怎能和青年競爭？」

「我身體不好，入了共產黨，十年就死了。」

「自己包袱多，得慢慢來。」

「怎能和他們比？我這得照顧家庭。」

這些理由背後就是一個捨不得的「自己」。反正不是反動派，共產黨不得寬大，而且還善於照顧，何必拚命呢？於是可以在「統一戰線」之下，逍遙一番。——這是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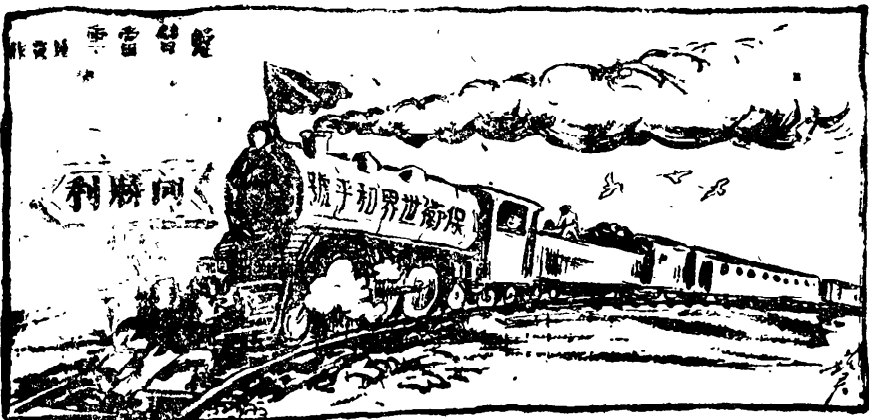
另一面，却不樂意有人超過他。排着隊，自己不動，人家怎麼會呢？於是原來沒有他進步的，一努力，却認真改進了，表現得處處比他積極、進步。這可使他不舒服了：「看，投機的人！」

「何必這樣熱中？想想去年不還是反對共產黨？」

「朋友，性急不得的呀，看了叫人肉麻。」

但是群眾却並不這樣看法，人民歡迎每一個進步的人。有的甚至入黨、入黨了。怎樣說呢？於是又有一套：「他不能不如此呀，不然就沒有出路了。」

在這裏又有一種唯心的「好人論」出現了：凡是沒有做過壞心事的，就不必操急，穩穩當當做人，不必圖進步。心虛的才需要坦白、求救。殺人殺多了，老來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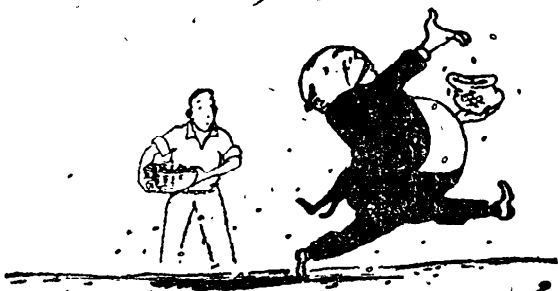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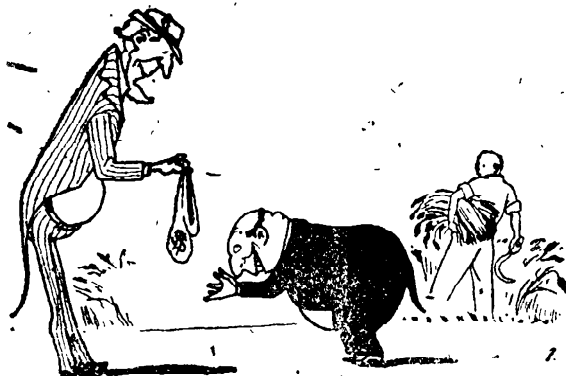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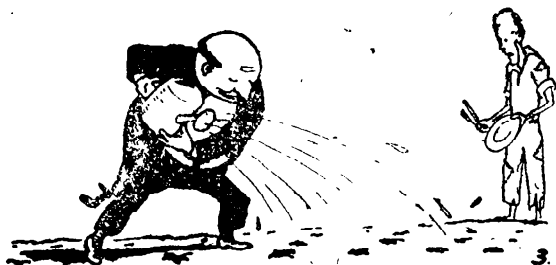


漫 觀
畫 察

1950. 4. 16

方 成 作

美 帝 的 魔 術



不 穩 固 的 障 碍 物 特 魯 卜 科 維 奇 論
 聯 合 國 關 於 一 九 四 九 年 世 界 經 濟 狀 況 的 報 告 指 出
 ， 雖 然 有 「 馬 歇 爾 計 劃 」 ， 但 是 美 國 一 九 四 九 年 的 經
 濟 狀 況 曾 不 斷 惡 化 ， 並 且 經 濟 危 機 日 益 接 近 的 後 候 會
 愈 益 有 力 地 顯 露 出 來 。
 (摘 自 報 章)



「 吉 田 開 始 逞 強 了 」 列 沃 繪
 不 久 前 日 本 內 閣 首 相 吉 田 在 國 會 中 發 表 了 一 篇 帶
 有 報 復 情 緒 的 演 說 ， 演 說 中 並 才 滿 了 許 多 反 蘇 的 言
 詞 。
 (摘 自 報 章)

信佛。原來就是本良心做人，半夜敲門也不會怕。開改造就因為不該要不得過了。我們是好人，祇要不是亂世，總是不緊要的。

這種論調骨子裏是要另找一個標準來安慰自己。以往以進步來勝過別人，現在既然別人比自己走得前了，就用「好人」的標準來自慰，自己還是比別人強。而基本上是激進的個人主義者。從以進步歷史來報功求賞，到妒忌別人跑到前面去，都是把革命看成了個人的出路。在這種人的心目中，沒有人民的事業，不但自己可以很得意於比較安定的生活而自足自滿，而且不會因為革命隊伍裏多了一個人而感覺到高興。

第四件是「懷才不遇」。上面所說那個人還承認有比他更進步的人在前面，而且對他們是畏懼的。還有一種人的包袱更重，就是覺得自己是在最前的一行。他覺得革命陣營裏沒有比他更強的了；至少在共產黨之外的進步人士中該是算最前進的了。比資格，比本領，比這樣，比那樣，總覺得自己都不差。誰，誰，誰都做了什麼事，而自己沒有，心理就氣不過。「別人還可以說，×××能做什麼，真是不服氣。」既不相信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又不相信政府是大公無私的，更談不到服從組織分配，在不同崗位上各盡所能，為人民服務；而是斤斤在名位上計較，不滿現狀。

這樣發生了懷才不遇的思想。這種思想是極不好的，不但影響了自己工作的積極性，而且稍稍動搖一下，就很容易給敵人俘虜過去。為人民服務的觀念沒有建立起來是基本原因，個人主義往上爬的心理使他不能實事求是地了解自己，幫助別人，反而妒忌別人而自甘消沉。自高自大地把自己的長處誇大，把自己的缺點抹煞，結果自然不會進步了。

打開了進步的包袱一看，真使人吃驚。我那位朋友的話——「我說的就是指你呀！」——把我一棒打醒。不錯的，多多少少，深深淺淺，我的確帶着這個包袱的。

這個包袱是那裏來的呢？是不是「進步」出來的呢？我覺得不是的。這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帶着的包袱的一種形式罷了，骨子裏就是民主個人主義，個人英雄主義，往上爬的心理，和革命的動搖性。一切的想法都沒有脫離「個人利益」，甚至「革命」、「進步」也都是從個人利益出發。個人主義者在反帝反封建的運動中是有參加的可能的，因為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對於半殖民地的小資產階級是不利的；束縛了他們個人的發展，爬不到大資產階級裏面去。在這時期，在這種程度上，他們是反帝反封建的。一旦封建主義打垮了，帝國主義打退了，小資產階級如果不加以改造，他們會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他們的個人主義使他們祇看到個人的利益，而看不到時代的方向；他們要求自己小事業的發展，而反對計劃，要求「自由」。因之阻礙了社會主義的發展。所以小資產階級有它的落後性。當革命進行到了要積極的向社會主義發展時，這種落後性就暴露了。表面上看來是落後退縮進步而來，本質上說這落後性早就存在了。

當落後性暴露的時候，却因為在它的初期曾經過了落後作用，這個面貌却回過來掩飾了落後性，使他們在客觀上不容易下决心來改造自己，因之，在這種情形下，過去的進步歷史成了阻礙改造的力量了。「進步的包袱」就是這個意思。我那位朋友所說的「規律」也祇適用於「以過去進步掩飾當前落後」的情形。這不應說成是必然的規律，因為過去進步的人應當更有基礎向前進步；客觀上更有更大進步的機會和鼓勵；主觀上也應當有更大向進步走的勇氣和決心。如果不利用這些條件，而故步自封，保守着原有的落後性，讓它去發展，結果以往這段歷史反而成爲包袱了。

進步並不是榮譽，而是每個人應有的生活方法。社會的生產力在發展，社會關係必然要跟着改變。我們的生活方法也就得跟着改變。生產力發展遇着阻礙，我們要衝破它，發生革命，是應當做的事，大家在做，沒有什麼可以居功的；衝破了以後大家有好處，沒有什麼其他報酬可求的。革命不是爲了別人，可以向別人領賞；是大大的事，大家得到自由。進步不是往上爬，而是跟着時代走；克服矛盾，心安理得，做起事來有效率，做人有意義，這才是進步；決不是爭名奪利，向人討好和賣弄的玩意兒。

大事記

一九五〇年
三月十六日
至二十日

步走的勇氣和決心。如果不利用這些條件，而故步自封，保守着原有的落後性，讓它去發展，結果以往這段歷史反而成爲包袱了。

確立爲人民服務的觀點才是丟掉一切阻礙進步的包袱的唯一道路。

四月一日於清華園

食污案，鐵道部決嚴格追究。

交通部航務總局召開航務會議，統一整頓北洋航運。

美帝積極釋放日戰犯，麥克阿瑟宣佈「宜釋放三條件」。

三月十九日
我保衛世界和平大會工委會首次會議，通過今年具體工作計劃，決加強全國人民國際主義教育及與各國和委會之間的聯繫。

林學部發佈指示開展春季造林運動。

青年團中央指示村青年團，保證百斤糧棉糧產計劃會議開幕。

三月二十日
全國勞動局長會議開幕。

公安部頒佈佈告，禁止外僑私設電台。

稅務總局電令各地稅務局，執行稅收日報制。

意共黨、社會黨聯合發表聲明，支持意勞動人民鬥爭。

美共工人日報發表社論，駁斥艾奇遜「亞洲政策」。

三月十七日
財政部發出關於公營企業繳納工商稅的通知。

鐵道部決定成立編制審定與倉庫清查委員會。

全國郵電首屆工代會在京開幕。

美、英、加三國在加會商，準備細則。

三月十八日
周外長發表談話駁斥艾奇遜「亞洲政策」底新陰謀。

中央救災委員會山東、蘇北、及平原、皖北兩區賑濟委員會，赴重慶區檢查救災工作。

交通部車伯鈞部長發表聲明：現在新加坡香港及各國港口的我國輪船均屬我國產權，不容侵犯或轉移。

鄭州鐵路局水塔工程發生大

美日反動派陰謀反共反蘇，遣停委員會無理誣訊日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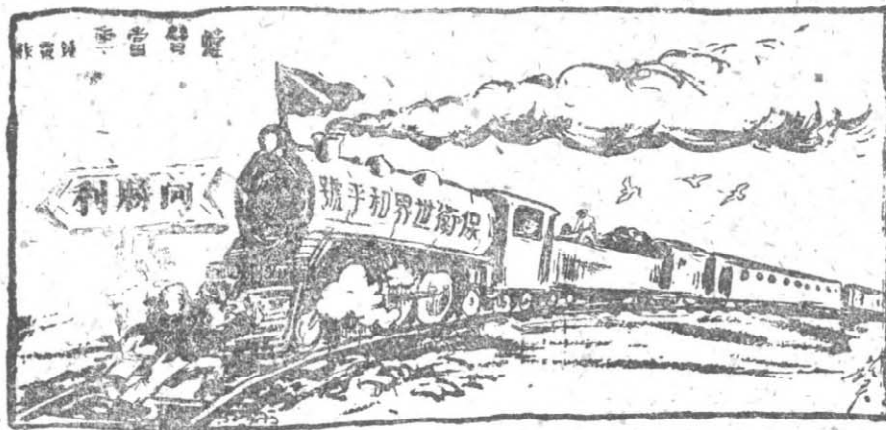
郵電部電信長途工務會議結束，製定長途電信具體計劃並保證其完成。

滬軍管會下令接收美帝經合總署撥下物資，分配各地救濟災民。

山東省首屆各界代表會議閉幕，康生當選省府主席。

和大常委會書記拉斐爾報告和大常委會工作並建議今年召開世界擁護和平大會。

美日反動派陰謀反共反蘇，遣停委員會無理誣訊日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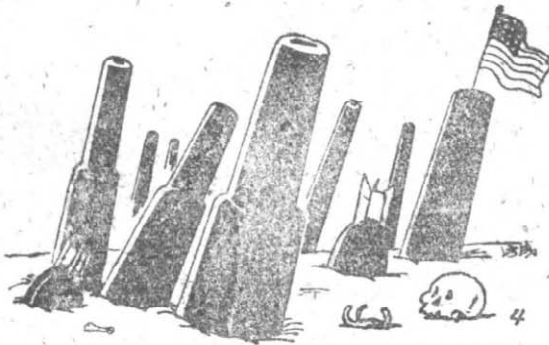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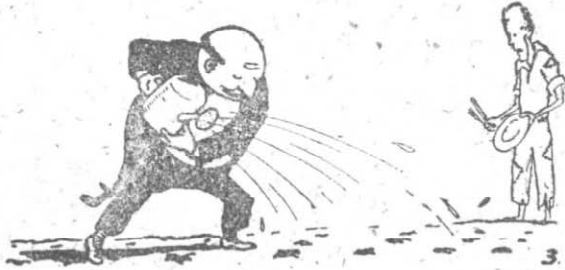


漫 觀
畫 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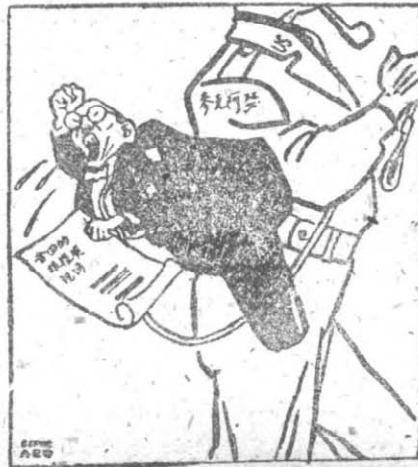
1950. 4. 16

作 成 方

術 魔 的 帝 美



不穩固的障物
特魯卜科維奇繪
聯合國關於一九四九年世界經濟狀況的報告指出，雖然有「馬歇爾計劃」，但是美國一九四九年的經濟狀況會不斷惡化，並且經濟危機日益接近的徵候會愈益有力地顯露出來。
(摘自報章)



「吉田開始逞強了」
列沃繪
不久前日本內閣首相吉田在國會中發表了一篇帶有報復情緒的演說，演說中並充滿了許多反蘇的言詞。
(摘自報章)

個群衆，爲什麼你不但不能幫助我，反而來打擊我？」老唐因爲陸承清這批評，老羞成怒，趁這個機會青年團文獻的機會，讓團員的空子，他的眼睛瞪得像一雙牛眼，臉皮紅紅地像喝醉酒一樣，對抗着的聲音很刺耳的說着，頓時弄得小組學習討論不下去了。一些同學看見這樣子在對抗思想，一致要求他深刻地自我檢討；另一方面陸承清同學却首先自我檢討，承認了不能耐心地團結幫助同志同學進步，反而影響了團、群關係的錯處。

四、孤立

可是老唐雖在衆人的威脅下，作爲了輕描淡寫的檢討向大家賠了一個不是，但他內心仍不肯罷休，暗暗地覺得「我落後就落後，與你們這些東西有何關係？」他在想更想情況愈變愈惡劣！別人批評他，動不動他就和人家吵起來，大家都感到難以對他接近，却無形中造成了他的孤立。這時他懷疑着團員同學組織統一戰線對付他，于是他看組裏另一個比較落後的同學艾寧拉攏在一起談心。

唐：「我覺得我倆也應該組織統一戰線來對付他們那些青年團員。你看組內同學都是跟着團員們跑，常常我一些雞毛蒜皮的事來批評備備，看樣子不是故意打擊備備還有啥？現在備備也用統一戰線來對付那些批評我們的人，給他一個批評上的報復吧！」

「你說得對！說得對！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我們要爭取一般非團員同學去我們團員的領導，這樣才不會顯得孤立。原來說這話的艾寧，是由于申請想自青年團員，組織上審查他不够條件，需要在團外考驗和教育，因此艾寧對團不能諒解，抱着敵對和忌妒的思想。

老唐和艾寧私人感情拉攏了以後，在小組裏更是滿不在乎。他越想拉攏一些非團員同學，但非團員同學也進步，都在

積極學習爭取入團，使他始終無法下手。有一次老唐打了一杯開水在小組內喝，旁邊有位同學老孫口裏滿得很，說着：「老唐！老唐！請你把開水給我喝一點。」以爲同之間，彼此喝誰一點開水，該也毫無問題，殊不知老唐真的不樂意地端着空子向老孫說：「俺這個落後份子，雖然落後了，却没有像你這個爭取入團的進步份子有一種刻薄級思想意識，不然你爲啥不親自去打開水喝？」他說着把茶杯使勁地朝桌上一放，故意給人特別難受的樣子。老唐！這時老孫知道他抱着成見，心裏覺得怪難受的，但勉強地裝出笑臉：「老唐！我錯了，我應該檢討！我不應該喝你的開水。」這次老唐以爲得到了勝利，心中很是喜歡。又過了不到半月，老唐和艾寧已叫人不放接近了，艾寧性子比較更惡劣急躁，看到第一組沒有人理睬，就覺得沒趣地不辭而別了。

五、調了一組，還是一樣

艾寧走後，老唐更顯得孤立，情緒上更表現惡劣，班政行看到老唐在六組已經關係搞得不好，把他另調到第九組使他換一換新的環境，並與老唐個別談話，安慰和鼓勵他，希望他能進步，另外時第九組同學們好好照顧唐唐同學。殊不知老唐到了第九組，落後思想一點也沒改變，仍是不接受批評，愛鬧别扭，當他又弄得孤立的時候，却說出風涼的話：「毛主席也曾說過光榮地孤立，我唐唐現在也是光榮地孤立。」學習共產黨黨章時，別的同學準備創造優良條件，表現中起治黃中立作用，學習中積極，一切運動中起帶頭和模範作用，一心想爭取做一個光榮的共產黨員，但唐唐却在吃飯的時候又說着風涼話：「我要創造這種吃飯的條件，爭取做一個黨外的布爾塞維克。」有的同學聽了當面向他批評，覺得他這種說話

太無立場，不顧及客觀情況，但他却反撲說：「俺們俺的玩笑，你憑啥來干涉我？」別人看見他又想一人吵架，不敢再和他多說，但有的進步同學（團員），却盡量地想着法子希望打通他的思想，幫助他能進步。

六、治病救人，對症下藥

老唐在第九組又搞得不好了，班主任朱作雲同志對他這種落後的情況漸漸已了解清楚，爲了治病救人，對症下藥，又把朱調到第三組。當他未到第三組以前，朱主任（兼團支書）動員了第三組的學習組長史若萍和團小組長劉秋鳴，是：「我們對於唐同志這種落後情況，要當作一個政治問題重新起來，尤其是他頑固保守，愛抱成見，我們要好好地向他，幫助他更快地進步，我們應該在日常生活中心以模範行動和優良作風，去對唐同學予以溫暖和鼓勵，（但這種溫暖和鼓勵是要有政治上的原則的，爲的是使他親身受到我們的黨和團的溫暖。）使他打破一切不必要的懷疑和顧慮，輕鬆地放下一切思想包袱，使他由落後變爲進步……」經過朱主任這番動員團結老唐的指示後，學習組長史若萍馬上召集了小組會議，傳達朱主任的指示。在會議上大家互相交換了意見，並遵照朱主任指示的原則討論出更具體的辦法，決定等到老唐調到三組時，首先舉行一個小組歡迎會，給他一個精神上的鼓舞，而且組內十一個同學（六個團員）一致表示決心和老唐團結好。行政小組團員會，另外團小組又開了一次會，兩個團員同學像斬釘截鐵的樣子，很嚴肅而有信心地發了言：「如果我們不能把老唐團結好，幫助他積極進步，那就說明了我們政治覺悟不高，我們要保證把團關係搞得很好，保證發揮青年團員優秀的作風和品質，保證完成朱主任指示我們的任務。」

七、用團結友愛衝毀落後的堡壘

經過這一番對唐唐同學團問題的思想醞釀成熟以後，學習小組長史若萍（團員）不慌不忙地拿着班主任調動老唐的條子，到第九組去用很親切而誠懇的態度，把老唐請到了第三組。當他一到第三組時，全組同學熱烈地歡迎他，這時却給老唐一陣喜歡又一陣懷疑。他心中暗想着：「俺調到第九組去時，誰也不大理睬我，今天調到這組來，却是這般的熱情，（他又亂猜）不對！不對！莫非非聽說我很落後，故意的刺激我吧？（他開始想開了）唉！怎麼我這多疑，反正是到底好壞，過幾天再看吧！」老唐露出了慚愧似的笑臉，接納歡迎會開始了。

主席（學習組長史若萍）：今天我們在團結友愛的基礎上，很興奮地歡迎着唐世岑同學調來了，使我們組裏覺得又添了一個生力軍。我們聽說近來唐同學心情不大好，這不大好的原因，多半是由于個別不大諒解他的同學，以爲唐同學是一個永遠不變的落後份子，這一點我們對他（指老唐）非常的同情，同情的原因是因爲唐同學與我們一樣的年青，一樣的是因爲唐同學活動力，我相信他決不會甘心落在別人的後面。今天，唐同學到第三組來了，但是我們都是同學，根本沒有什麼彼此可分，這個歡迎會也不過是一個爲了團結得很好罷了。唯一的希望，今後我們互相多提意見，互相批評鼓勵進步……」老史很和藹地講完了這一段主席開場白，博得大家一陣掌聲。老唐覺得這些話講得誠懇而有感情，臉上露着從來沒有過的喜色。這時老劉覺得他已經高興，也趁熱打鐵地再給他一個富有團結教育的啓示。

老劉（團小組長）發言：「現在咱們舉行了這個歡迎會來歡迎我們的唐同學。回想剛來華大時，我和老唐却有一段笑話

也，許大家聽了會笑的（因為老劉早已熟了老唐）。記得剛來華大時，我和唐世岑因為都愛抽香烟，不約而同地交成了抽香烟的朋友，彼此雖然很窮，却準雙方把錢湊在一起共買一包香烟，有時放在我腰包裏，有時也放在他腰包裏，不管誰吃得多誰吃得少，雙方不分彼此，都能互相諒解。固然這種友愛是建築在雙方利益的私人感情上的，但說明了老唐是可以與人合作的。不過在今天來說，我們對自己的要求，就應該以「革命的知識份子」為標準，那就是我們一切利益要從人民的利益出發，那麼我們在這新的社會裏，才不致于落在別人的後面，才不會被人認為是一個新社會裏的愚蠢頑固自私的可憐虫。我們要把不分彼此共同抽香烟的私人感情，提高今後在學習生活上，互相批評，互相督促，互相諒解，互相樹立為人民服務而學習的思想，共同進步。我相信老唐一定會充滿着熱情和我們挽起手來競賽的。

由于老劉比較了解老唐的性格和思想情況，這一番講話，却眼眼地把我老唐弄出愉快又辛酸。他暗暗地作着自我鬥爭：「我雖不是有為人民服務的思想呢？我是不是一個頑固自私的可憐虫呢？」他開始感覺到有些問題了，但仍是露出喜悅的神態，聽到第三組的同學們為他歡迎而發言。這一個同學說：「老唐到第三組來，帶來了很多歡喜熱烈的革命感情。」那一個同學說：「咱組裏多添一位生力軍，似乎顯得團結友愛的力量，而且空氣也似乎非常輕鬆愉快。」於是這更多的政治團結感情的洪流，在衝毀着老唐舊後思想的堡壘，又在灌溉着他新思想產生的萌芽。在歡迎會上，有人請他發表意見，他仍是回答：「沒啥！沒啥！」但這個「沒啥！」却是一個歡喜的「沒啥！」

八、把自己獻給于黨和人民

當天晚上，老劉（團小組長）替老唐

的忙，把他的舖蓋行李搬到了第三組同學的股室，恰好和老劉老史睡在一個小房內。當睡眠時，老史和老劉發現了他缺少幾的褥子，天氣非常冷，他又不情願向人求借，于是老史和老劉商量，將他倆共睡的一床絮絮褥子，讓給老唐睡吧。老唐覺得：「我少受你們的，你倆睡吧。」還是自己抗着皮受一點冷吧。」經過老史和老劉齊聲說道：「沒有關係！沒有關係！讓你睡吧！我倆還有墊的褥子可以共睡，你好好的墊着睡吧！」（說着老史已經把絮絮褥子拆開了）老唐覺得他倆思非常誠懇，便很自然地接受了褥子。他開始睡覺了以後，老史和老劉却用一床破舊的毯子鋪着共在一床睡覺。第二天早晨起床，老唐發覺他倆墊着一床很薄的舊毯子，看樣子這毯子的歲數已很老了，老唐見了非常地感動：「的確我很感謝你們，你倆把這新的褥子給我，怕我受凍，却向自己受凍嗎？你倆太照顧我的溫暖了，我委實覺得沒法報答。」老唐流着兩行感激的淚，老劉接着對老唐說：「我們都是同學，互相幫助，應該如此，回想我在四個月前，害了一次沉重的傷寒大病，幾乎要送命的時候，班裏系主任深更半夜起來為我請醫生，結果把我的病診好了，我感謝系主任，但系主任却說：『我也是受了黨的愛護教育，培養，才有今天的一日知道愛護你們，希望你把感謝我的情感貢獻給黨和人民，因為只有黨才是最愛護青年的。』當時我聽了系主任的話，不知怎的感動得流出了眼淚，因為我感覺得過去在舊社會裏受着毒化的教育，受着國民黨一切壓迫、剝削、欺騙、腐敗，使我不認識共產黨，却對共產黨處處存着懷疑和內心的污蔑。自從系主任說開黨對我的教育愛護以後，我對共產黨已深深感覺得愧，我才知道我害病就是共產黨治好了的

我才感覺得共產黨是撫愛着中國人民的偉大慈祥的母親。」（事實上老唐早已知道老劉過去害了一場大病，但老劉把害病經過的真實情況告訴給他後，由于老唐地主家庭環境的思想包袱尚未完全解決，雖一時有所感動，但思想和感情上却起不了大的變化。）老史覺得老唐聽了老劉這段真實的事情，仍不能表示自己的私人感情，拿老唐感戴着讓老唐說：「老唐！你不必總覺得這件小事沒法報答，我們之所以能夠幫助于你，也正是由于我們曾受到了黨和團給我們的愛護和培養，因為黨和團是教育我們同志團結友愛的，所以我們在同學之間就應該互相幫助。但我們覺得實在作得太不夠，假如你是真感謝我們對你有所幫助的話，請你也不妨對老史說一聲，把感戴之情獻給于黨、獻給人民。」老史這以無限忠誠對黨和團感戴的樣子說出了這話後，却把老唐這一切對黨和團懷疑的包袱打破了他，他想：「老唐害病岌岌可危時，黨班主任的關心，切，深更半夜延醫診治，終於把病治好，從這一點上，已說明了共產黨是真正愛護青年的，他再想一想，我家雖然是地主，但我何必這般懷疑共產黨打亂殺呢？如果要照老劉害病的這回事看來，我覺得多餘的懷疑。」老唐內心這樣的想，却仍不好意思說出對共產黨懷疑的包袱，但表面上有些感動而慚愧的樣子對老史說：「好吧！我聽你倆的話，把我的感情獻給于黨，獻給于人民。」（其實老唐思想上是有轉變但沒有會到政治感情上去）

九、開始積極

由于老唐環境鼓舞了老唐的心情使他精神上比較從前要輕鬆得多，雖然他有時仍有些疑慮但起前小得多，所以他漸漸能夠安心學習了。接着恰好學習土改政策，聽報告時要算他最注意，每一句也都扼要地記下來了。在討論會，別人熱烈地發言，他也很興奮精神地聽着。本來大部份同學早已對土改政策有所認識和擁護，學習組長為了照顧老唐的思想和情況，提出了一個討論題目：「究竟地主的養活農民還是農民養活地主？」緊接着一番熱烈的討論，主席綜合了大家一致的意見得出了「地不依靠地租剝削農民，自己不勞而獲，專受享受舒服，站在農民的頭上，與國民黨反動派的利益是一致的。農民終日勤勞，不獲暖飽，將一年辛苦收穫的糧食，都交給地主作租子，有時農民交不起租子，地主還要逼着反動政府的勢力在鄉裏壓迫橫行，有些農民的女兒還被地主強姦，有些農民為了交不起租子而被逼得自殺上吊……從這各方面看來，當然是地主剝削剝削而農民所養活的。」

老唐聽了這沒有關於土改問題的討論，心中覺得「對呀！對呀！土改是應該的！」可是老唐却不知如何掌握鬥爭地主的方針，把地分給貧雇農。接着討論有關土改的總路線和總方針，有的同學用事實說明了共產黨領導土改，是以道理說服教育地主使地主從自覺的基礎上把田拿出來分給貧雇農，並且提出了鬥爭地主，反對亂打亂殺報復地主的偏向。有的同學說：「實行土改是為了把封建後的農業國變為進步的工業國。」有的說：「實行土改是為了耕者有其田，打破舊社會封建土地不合理的剝削制度，使廣大的農民積極地為自己加緊生產，繁榮社會經濟，把新的中國好好地建設富強起來……」老唐聽了這些道理，感覺得是很對的，（尤其其關於中共領導土改反對不合理的亂殺亂打的偏向。在過去有個別的工廠幹部由于階級仇恨太深，對於鬥爭惡霸地主，容易感情衝動，激起了仇恨報復地主，但現在由於黨的政策

他漸漸能夠安心學習了。接着恰好學習土

京漢道上

江橫

三月十九日晚八時

一刺，我乘一三七次普通快車離了首都北京，踏上到西南邊陲的漫長旅途。新的旅途生活，使我充滿着憧憬的新奇和興奮。

列車載着無數的人羣，又不斷地吞吐着各色人羣，像人體上的大動脈一樣，在夜色茫茫的大地上向南駛進。人與人的關係，或物與物的交流，就通過這一根粗得——大動脈管，很快的被交流和聯繫起來。它——鐵路已不再是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們進攻人民和掠奪資源的工具，而成為促進新中國經濟建設、密切城鄉關係的人民的大動脈了。

夜色逝去，晨光照來。列車抵達正定後，已是春光照滿麥苗，農人耕鋤在田野，一幅春耕圖隨着車行速度在人們的視線下逐漸展開開來。

和這幅春耕圖同時，在人們視線下展開的，還有一幅交通建設圖。瀾依在正定城南的滹沱河鐵橋，在戰爭中被炸毀的十幾座橋樑，經過三個月來員工們的努力，已經完全築成，現正

全力得架築而巨大的橋身。在橋身上，鋼骨水泥的橋墩上，還可以認到一行行紅色的大字標語：「建設人民的鐵路——為中國偉大的經濟建設服務」。今天他們正在爲修築這一偉大的行動口號，而在冰冷的河水中做着艱苦的勞動。因此，也可以完

全這樣說，修復交通的本身就是——種偉大的建設工程。何況像這樣艱鉅的工程，還不只此一處，像京漢路上便有長短三三十里被戰爭毀壞了的鐵橋，今天也同樣地在人民政府統一的籌劃下，由員工們農民們協同修築着。據我沿途在滹沱河、漢河、三道河等各處所見到的橋樑，已全部進入完成階段，現

在則是等待運來橋身和架橋的工程了。他們爲避夏季洪水暴發，影響南北交通，決定要在五月前完全修好這一戰爭遺留下來的引橋。把木橋變爲鐵橋。而且鐵路局在那時，也將增加開行特別快車，把京漢間四十八小時的行車距離，縮短爲三十小時。

員工們流着汗，鏟築鋼骨水泥的橋基，

或站在層層疊疊三四丈高的木架上架橋樑，或看到由農民們從深山僻野運來成堆的枕木和山條時，以及一座一座的鐵橋行將在無數的河面上架起時，有正義感的人，都會深深體會到今日政府爲什麼「取之于民」，又何以「用之于民」的意義所在；當然這僅僅是許多側面中的一個面。可是，我在列車上以及北京時，就會聽見有些商業資本家的叫苦；當他們乘車通過過咬作響的木橋時，也叫喊過「危險」，當他們的貨不能暢銷時，也叫做「沒銷路」，「要趕快修復交通，打通城鄉關係」。……然而，一遇到真正修復交通，需要他們拿出百分之幾的稅收負擔時，他們却大喊大叫「殺重」了。就在這種短暫的旅途中，我會發現被火車暫時聯聯起來的這樣一種社會關係。從有家莊、邢台、邯鄲、安陽、……上下三等車的人羣中，幾乎全部是戰士、職工、農民、小商人模樣

的男女旅客，有的扛着扁担，有的夾着小白包袱。然而在二等車箱上，以及在二等車上，其間雖也有極少數的解放軍官員及其家屬，但大部是商人模樣的客商，有穿西裝的老闆和他們的太太，有穿長袍或制服的私營商店職員。我曾先後探詢了我周圍的五四商人，他們有的是到新鄉、信陽探購山貨，有的是回到西安、廣州自己的店舖裏去。

車過安陽，已是傍晚時分。在霞光映照中，從車窗中可以瞭望到昔日奉制廢王袁世凱的墳院和花園。距今會幾何時，袁世凱第二——蔣介石，也已經被人民打倒在地，躺到墳墓的邊緣，歷史的命運已註定人民的時代像春天一樣的降臨到人間了。

在漆黑的夜色和朦朧的煙塵中，人們安全地渡過了中興第一長橋——滹沱河鐵橋。我醒來時車已抵達歸城車站。歸城爲中州軍事重地，隔河的黑河與附近貨物集散地。抗戰初期，我曾由洛陽徒步經此到武漢。那時黑河的繁榮可與周家口並駕齊驅，但後經匪幫軍騷擾劫掠，已遠非昔比。

第三日(二十一日)午，車經中州南部第一軍事要城——信陽，向「壽陽三關」(平陽、九里、武勝)疾進中，牛欄在走向死亡，新華物爲什麼能發生和滋長

三月二十三日寄自漢口

(上接第二十七頁)

尤其是這次參加了艱苦的碎石工程後，鍛鍊了我們堅強的意志，沉着的精神，克服艱辛、急躁、脆弱、動搖等等的弱點，培養了我們的組織性和紀律性，也使我們體會到集體勞動的偉大，體驗到集體勞動如何培養成工人階級的先進特性。

本學期的工讀計劃

現在我們上課了，工讀的條件，有了新的轉變，不能像在假期中幾乎把全部的時間都放在工讀工作上，我們要照顧到功課，我們將把工讀轉向經常化，要長期地堅持下去，要與一九五〇年全國生產救荒結合起來，這就是說，我們要展開以農業生產爲中心的工讀運動。

校委會撥給工讀同學的農場，在一百畝至二百畝之間，我們有農學院教授作技術上的指導，我們有很好的種籽與肥料，有專門著作物治病虫害的教授，有慈愛的牧師教我們養豬喂鴨，萬一我們的牲口生了病，我們又有現成的獸醫學教授，給我們打針吃藥，……我們在這好的條件下來進行農業生產，展望將來，我們懷着無窮的希望。據農學院生產籌備會的初步估計，假定我們種一百畝的土地，按最低限度的收成，可收穫二百石米，總百分之二十的農業稅(學田)外，可以解決一百個同學一學期的伙食費；我們又將在十幾個油塘里蒸一萬條魚秧，一年後可收入二百石米；現在我們的碾米廠亦已成立了，不日即可開工生產，每日可以碾米二百石，所得的報酬，也可以解決許多同學的經濟問題。

寒假工讀給我們這一學期工讀互助運動的開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我們爲了要戰勝祖國財政的困難，爲了積極參加人民建設事業，爲了要掃除新民主主義學習的障礙，我們浙大人，將以更堅定的信心和更熾烈的熱情，把工讀互助運動堅持下去！用自己的手，來解決自己的問題，同時，又能幫助國家克服經濟上的困難，這是浙大人的光榮，也就是毛澤東教育下的青年的光榮！

記東北春耕以前的備耕工作

王政

「該是開耕了吧？」這是一句東北老鄉常用的慣語，意思是說，當江中的冰凍開始溶化的時候，也就是春耕的時候到了。

春耕是農村中的大事，從這一個時期開始，就要打定一年收成的基礎。誰不願意在這時多加一把力，在秋天多收一些果呢？尤在今年是勝利後的第一個春耕，是個大生產年，又在自己的土地上播種，為了自己、為了國家、為了黨而革命的成果，大家更是顯得喜氣洋洋，格外加勁了。

今年全國農業生產的總方針是以恢復為主。在老解放區，由于土地大部完成，所以農業生產希望比去年提高一成，對於某些生產條件比較好的老區，更希望能夠取得復戰前水平。在東北方面，高崗主席在去年東北農村工作座談會上曾說：「明年東北的產量，要按常年產量要求放地地多產十斤到二十斤，提高農業技術與開荒，增修水田，以及增加

副業生產的收入，此外棉花與特種作物亦必需按計劃完成，這是最基本的要求。」這一個提議的數字，還不能說已超過「八一五」前最高水平，但一般的講來，由於農民的負擔減輕，收入普遍增加，東北一般農民的經濟狀況都在上升；有些縣份的糧食產量已經達到了「八一五」前的水平。（如榆樹，這是東北產糧最多的縣份，佔全部產糧的百分之十。）（引自高崗主席對農村工作問題座談會上總結發言）

今年東北農業生產的任務，就是要爭取一千八百萬噸糧食而奮鬥。在春耕的準備工作中，動員了各級縣區幹部以及廣大農民群眾，有計劃地開始了這一個偉大的目標。

自從去年冬季高崗主席在去年東北農村工作座談會上曾說：「明年東北的產量，要按常年產量要求放地地多產十斤到二十斤，提高農業技術與開荒，增修水田，以及增加

月二十八日，東北人民政府發佈了關於深入檢查春耕與發動春耕的通告，使春耕的具體工作更形明朗起來。在這個通告中，首先警惕各級人民政府注意「不少地區存在着自滿和自流的現象」，其次注意「今年製造的改良農具是否已經發到農民手裏？農具是否已經送到地裏？農具是否够用，是否試驗？農具是否無困難？人吃馬嚼是否缺少？互助小組的組織如何？軍烈屬是否安排妥當？植樹的樹苗是否栽到等等」。

由於氣候的關係，東北春耕時間，一般要在清明前後，可是最近清明時節，春耕已到了後階段，如果在這一個階段裏，春耕工作還沒有徹底做好，那麼，無疑地將會影響春耕的。

在今年春耕的備耕工作中，實物在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它和去年的春貸不同，主要的實物是放貸時不以現金貸給農民，而以實物貸給農民，因為這樣

可以保證貸款用於生產，並且可以免去農民拿現金再去購買實物的麻煩，同時免去了商人從中的剝削，使工農產品與供銷結合，溝通城鄉關係。在政府方面，也可減少貨幣的發行，只需在銀行中轉帳就解決了問題。

前面所指的實物，係指以改良的或新式的農具、優良品種、牲畜、肥料、青苗、農藥、口糧、馬料、小水利工程，以及某些特產為主的。在這次東北銀行發放的實物春貸一萬二千億元流通券中，分配實物的比例是這樣：改良農具約四萬五千台，佔總額的百分之十五；肥料約九萬九千噸，佔總額的百分之九；青苗約四萬九千噸，佔總額的百分之九；優良品種約四萬九千噸，佔總額的百分之九；小水利工程約四萬九千噸，佔總額的百分之九；特產約四萬九千噸，佔總額的百分之九。

總額百分之之十四點七八；牲畜貸款佔總額百分之十五點六七；口糧、馬料及小水利等項佔總額百分之九點七八；特產貸款中棉業（包括棉花、棉絮、棉紗）佔

農貸總額百分之十八點五九；漁貸方面佔農貸總額百分之三點五八；軍樹、榨蠶、煙草、肥料、青苗、農藥、火柴、棉藥等共佔農貸總額百分之六點零四；至於農林部貸款，通過東北亞細亞管理委員會發放。

從這一些實物春貸中，我們可以看出政府是怎樣具體地解決了農業生產中關於資金和生產資料方面的困難。為什麼主要的解決生產資料的困難，而不是解決生活資料的困難呢？從增加糧食的目的上講，唯有用新式農具或改良農具，優良品種，以改進農業技術，才能提高農業生產力，為了結合今年的農業增產任務，所以主要的使着重在生產資料的幫助。同時還主要的解決組織起來，組織生產的農民在農業生產中的資金困難。因為組織起來的力量大，能夠節省人力、物力、財力、畜力，能提高技術，多打糧食，發展生產，使農村經濟逐漸由單幹轉向互助，由個體走向集體，所以，國家

總又主要地、有計劃地加以扶持和推動。這一項有計劃性的實物農貸發放，在東北各省已完成了大半的工作；像黑龍江省東北銀行分行和各縣支行，從去年秋天開始進行了準備實物的工作。目前在農具方面，除鐵錫成套新式馬拉農具十套，已由省農林廳分配給農業生產條件較好的十個縣份重點使用外，至三月七日止，全省各縣已備妥各種改良農具五六一〇件，大車七三三台，馬匹九一七四匹，其中除已買回並貸到農民手中五六四七匹外，其餘正由各縣通濶縣社組織群衆至內蒙海拉爾成批購運中；種籽方面，省分行現已備妥優良麥種二、三八九、八〇三、優良豆種四六九、六四七斤，優良穀種一五五、七〇四斤，馬料已備妥豆餅四〇五、九二五斤，高粱三十五萬斤，現在開始一點發放。

吉林省各縣自二月間，便已着手各項種籽貸款的準備實物工作，其中豆、麥、高粱、稻子等種籽，已開始發放，現已大部發畢；水田化糞肥料三千五百噸，現已完全運抵所管各縣；貸款的改良農具：〇、二四七台，現亦開始發放。

其次如松江省在各地農具工廠訂製大批新式農具外，另外從蘇聯購來農具六百四十餘件，準備了優良種子大豆四百萬斤，稻子三十二萬八千斤和其他各物，均已撥到各縣進行發放。熱河省自一月初旬成立省農貸生產貸款委員會後，各縣相繼成立貸款委員會，並開始發放實物，如察城等縣發放實物，如農具、牲畜等，已於上月十日貸完。遼西省於去年十二月底亦成立了包括銀行、各級政

（下接第二十一頁）

小組漫談主要為發露思想，不作深入論辯，閱讀資料則應聯繫實際，聯繫自己的思想，許多院系都採用互助小組的形式集體閱讀。

(四) 歸納各種不同的見解展開討論：小組漫談以後，經過小組的彙報，由各院講課教員歸納各種不同意見成爲幾個中心意見，針對這幾個中心意見，各院講課教員分院進行補充啓發，然後舉行小組、大組討論。小組討論從基本問題上有重點地進行，避免枝節與空洞；

生活學習打成一片

一片

由於在寒假期間學生共同進行了課程改革運動，已爲本期的政治學習初步奠定了基礎；所以，在這次學習運動中，學習的熱情和態度都提高了一步。

各小組大都訂了「學習公約」，在行動上要求按時作息，到會到課，遵守秩序，在學習上要求精讀文件，思考問題，準備發言提綱，總結思想，整理筆記。清晨，各院舉行集體早操，集體唱歌；課餘，各小組進行勞動生產。

(五) 理論結合實際，進行總結：爭論結束之後，經大組、系、院、大班彙報，進行歸納，由講課教員集體研究，作出大組總結。總結中教員既要照顧各院系的爭論，又照顧各單元的要點體系。

各大小組展開「評模」、「反老油條」運動，師範學院的教育藝術兩系特別在黑板報上每日總結各小組學習情況，以參加小組學習總結，討論的動機爲標準，公開揭示誰是老油條，誰是模範。生物系更明確地揭發老油條的不主義。

收穫與偏向

一、初步樹立了勞動觀

學生會生產部配合了學習中「勞動創造世界」的理論，發動了春播，（按：南大的課餘生產是有成績的，去年十一月一個月即收穫蔬菜四千五百餘斤。）把全校熟地十一畝和荒地十畝左右分區劃清，統一分配，依學習小組爲單位，每組分到兩畦地。以三月十三日至十九日爲「勞動週」，各組同學在課餘的時間裏，做着翻土、整畦、施肥、播種等工作，宿舍前

的草地，不到幾天工夫，都成了一畦畦的園地，排列得那末整齊，發出泥土的芬芳氣息。在各院同學的勞動中，工學院同學幹得最認真，他們已提出要在生產工作中奪取「紅旗」的要求。有些不惜於勞動的女同學，這次也脫下了旗袍，起勁地幹着拾糞、澆水等工作。大家都說，在學習了「勞動創造世界」的理論以後，我們要通過實地的勞動生產，來改造自己，糾正過去輕視勞動的錯誤觀點。

收穫與偏向

二、初步確立了階級觀

「我們階級教育必須造就愛好勞動，習慣勞動，善於勞動的教師來，不要再陷以前教育的覆轍。」通過這次學習，除了少數基督徒還堅持「上帝創造世界」的偏見外，大多數都初步樹立了正確的勞動觀點，而且參加了實際的生產勞動。

二、初步確立了階級觀：在階級社會裏，已公認的真理。法律系楊兆龍教授分析自己的階級成分時說：「我小時家裏窮，受貧富懸殊的剝削很深，造成我引後的個人主義，一心

一意想出人頭地，往剝削階級裏爬。」他表示要丟棄過去尊嚴與身份的虛榮觀念，堅決向自己的階級開火。外交系陳嘉教授說：「我從前所以喜歡讀那些俏皮的英國小品文與喜劇以及現代英國頹廢派十分難懂的詩歌，主要的原因是因爲我的小資產階級性，使我沉醉於這些小資產階級作家爲小資產階級讀者們所寫的文學作品，我認爲這次對於「階級性」的了解，將使我對於一切中外文學作品，更認真的去批判。」從前堅持自然科學本身無階級性的人，也開始明白如在世界觀和方法論上加以檢查，也是具有階級性的。在學習士改問題以後，大家又看了歌劇「劉胡蘭」的演出，更加深了對階級鬥爭的認識，表示決心參加秋收後蘇東區的土地改革工作。

但不可忽視的，在學習中也產生了某些偏向和缺點：

一、暴露思想有顧慮：無論漫談或討論時，還不能完全除去顧慮，不敢充分發揮自由思想的剝削階級性，因此不能聯繫自己實際的思想情況，搬書

爲了總結這一次學習運動的學習經驗，鞏固學習成果，並糾正學習中所發生的一些偏向，以便使今後較長時期的學習更加推進一步，所以在三月二十七日晚，由系級平副處長對全校師生員工，作了一總結學習的動員報告。

「四一」週年紀念就要來了，南大人將以「總結學習」的方式來紀念這一個光榮的日子！

(三月二十八日寄)

華羅庚教授回到了祖國！

孫執中

「華羅庚教授回來了！」在清華園的初春裏，這幾天來，人們到處都傳播着這樣的消息。儘管有許多是不相識的，或根本還不大瞭解華先生在世界科學界的成就有着怎樣的地位，但對於華先生拋棄了無論在研究工作上或在生活上比較方便的美國環境而毅然決然奔回祖國時還可能有困難的祖國，是寄與了熱烈的歡迎的！在四月一日的晚上，清華大學的「學生會」和「教育工作者會」兩個團體會舉行過一次歡迎華羅庚等教授回國服務的晚會。會上與會後，華先生曾談到過一些美國的情況。

留美學生近況

當問到中國留美學生近況時，華羅庚教授說：「很坦白的說，留學生們出身大部份都是小資產階級或資產階級，再加上在美國的環境裏每天所聽到的所看到的，都是些帶有毒素的惡意宣傳，和一些歪曲事實的報導，所以在這樣環境下的中國留美學生，如果國內的學生要落後些，那是不足為怪的！但是客觀條件雖然如此，在美的同學却依舊非常關心祖國的消息，想盡方法希望知道祖國的真相，例如，在我回來的時候，當他們向我珍重道別時，幾乎沒有一個人不說：『寫信來告訴我們有關祖國的消息！』」

「美國各大學的中國同學會，大概是不很談政治的，一半的原因，是由於傳統的關係，一半的原因，是由於有若干的同學怕觸怒美國的當局，（因為中國留學生的生活費用，一部份是靠自己工作，一部份是靠美國 E. C. A. 的救濟。）因此，關於政治的討論，就不在另外的組織裏展開。比較著名的，是兩個汎美性的組織，一個是「中國旅美科學工作者協會」，還有一個是「北美基督教學生會」。這兩個團體是比較進步的，最近「科學工作者協會」正在發動一個回國運動，每一條船上，都有「科學」回國的同學。

「北美基督教學生會」也是非常好的一個團體，（請不要因為其名稱這三個字而誤解他的前進性。）每逢假期，他們都舉辦一些夏令營之類的工作，時常討論一些國內的當前形勢和世界上的進步思潮。除掉了這兩個泛美性的組織外，地方性的團體也很多。例如紐約的「新文化協會」等等，都在盡一切的努力向國內同學看齐。不過，一般說來在美國的中國同學不能像國內的同學們這麼幸福，能有充分的時間來學習新的理論，新的形勢。他們每月祇有一次或頂多每週一次去學習新東西的機會。以我自己來說，在美國時日以爲，算很進步，但跟國內同學同事的水準一比，就差多了！

「也許諸位很關心所謂『自由民主黨』的事情。據說活動得最力的要算蔣廷黻了！記得有一次會裏有一個朋友和我談起過：『我們好不好來一個第三條路線？既不靠國民黨，也不要共產黨。』我就對他說：『請你起草一個黨綱，不過千萬不要以我們這個在美國的人作對象，只要國內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同意這個黨綱，然後我們再討論其它。』後來這位仁兄只好自認失敗。的確，假定在美國組織這樣的一個政黨，其前途是決無希望的。除開「主義」「信仰」之類不談，有什麼利益可以去吸引群眾呢？在美國的中國學生，不是終久總要回來的嗎？掛號名黨黨員的事誰願意去做呢？我想，第一這個政黨出現的話，那末，在人的嚮導，除國民黨的戰犯之類以外，恐怕是很難吸收到其他的人參加的！」

美國一二三事

問到美國科學界的近況時，華羅庚教授說：「大約在二個月以前，美國科學界發生了一件大事，就愛因斯坦發表了他的『廣泛引力論』，這對於美國的資本家們可能是很有用處的，於是報紙上對他大大的捧了一陣。可是，趕到一個月以前，愛因斯坦又發表了談話，警告美帝不要隨便玩弄氫氣彈。這警告惹惱了資本家們想獨霸世界的迷夢，於是便由代表資本家的利益議員們出來談話：『愛因斯坦早就應該驅逐出境，我們不能因為他在科學上的貢獻而忽略了左傾思想，其實，愛因斯坦對於原子彈的製造是毫無幫助的！』」

「爲什麼美國輿論對於愛因斯坦的態度會變得如此之快呢？我想，這一點，諸位比我知道的更多，就是：美國是一個資本主義的國家，所有的輿論都服務於老國們的利益。主人對於僕人可以利用的時候，就「捧」一下，當僕人出來想揭開老國們的行動時，就自然不免會遭遇到老

國們的「憤怒」了！這就是美國老國們對科學家的態度上回憶我一九四六年去蘇聯時，我看到蘇聯政府對科學家的尊敬，就可看出美國和蘇聯對待科學家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我曾在蘇聯看到一位很出名的大數學家，胸前掛着兩個金質獎章，一個是斯大林科學獎章，一個是勞動英雄獎章，這位數學家告訴我：這面祖國對他的榮譽和獎勵。多麼顯明的對照啊！一個是仰仗資本家們的鼻息的僱傭，另一個則是受人民尊敬和愛戴的腦力勞動者！」

「關於美國備戰的情形，也許諸位也非常關心，自從美國的原子彈外交破產以後，就盡氣宣傳所謂『氫氣彈』，但是，由於世界人民的愛護和平，我相信這個外交政策的破產，也是毫無疑問的。舉兩個例子，可以供各位參考。一九四八年我在英國遇到一位數學界的友人——戰時曾做過上校——我問他美國備戰的宣傳倒是很熱烘烘的，英國爲什麼還不大談。他答覆說：『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發生，誰勝誰負，我們還不得而知，不過，有一點是清清楚楚的，那就是——倫敦將要變成廢墟。』這看法是很實際的！有一次，另外一位朋友同我談起：『在所有人類戰爭的歷史（華先生補充說：不過照我的意思要加上上一句：『在所有資本主義社會的戰爭歷史』），凡是幾個國家共同作戰而獲得勝利的，與實總是落到第一流強國的 hands。第二流的國家，是永遠沒有贏過戰爭的！第一次大戰後的法國，第二次大戰後的英、法等國就是很明顯的例證。』從這兩位英國朋友的談話看來，可知美國想在歐洲找到正當炮灰的同盟國，是不大容易的！」

天才和努力

華先生的父親是一個小商人，早年纔期望華先生將來可以做個銀行或公司之類的小會計，因此在初中畢業以後，就給他進了上海中華職業學校，但讀了一年以後，就因故失學返里——江蘇金壇。由於家庭經濟環境逼非，迫使他不得不負起家庭的重担。當時他除在一個中學兼任會計和庶務之外，每天還得在家照顧自己所開的一家小生意（這個生意小利香煙只能一根一根的零售，煙攤上擱有一根根燃的香，以便顧客吸用）。在這兩項繁重的工

作以外，他依然沒有忘記苦讀的自修。當時他在數學上想起了許許多多的問題，當他把這些問題拿到雜誌上去發表的時候，有的可以刊登出來，有的却遭到了「原稿退還」的命運。據說附回的理由是說：『你們這個問題，某某某人口口聲聲說：『這樣，更增加了華先生的勇氣

「也還不錯，我思的問題，居然也是人家所想到的！」經過了六年這樣自修和思考的結果，（從十六歲起到二十二歲止），由於發表了一些論文的緣故，使當時清華大學數學系的系主任熊慶來先生發現了他的天才，於是熊先生就到廈門打聽這位為文章的青年是「那個大學畢業的？」後來還是由於一位在浙大數學系當助教的小同鄉的介紹，才把他請進了清華。但是由於他沒有大學畢業的資格，所以初入清華時只能當一名助理，一年半後，實由於他在數學上的天才和努力的结果，便升任了助教，又經過半年以後，升任教員，教員做了一年以後便升為「文化基金研究員」，不到五年的時間，他打破了一切大學的制度而連升了四級。這雖然也是由於華先生在數學方面的天才，且刻苦而進修，也是成功的一個原因。華先生說，在這段時間內（其實現在也是如此），每天早晨八時就一定走到數學系的辦公室去了，直到十二時才出來，午飯後看一報，就接着上系辦公室，六時到大飯廳吃飯以後，散步一會，就又走到科學館（系辦公室）了！在不斷的努力中磨練了自己的天才，天才更提高了他努力的興趣，在這五年裏，雖然他是連升四級，但和他在數學上的成就相比起來，依然是不很相稱的。一九三六年的時候，學校保送他到英國劍橋大學去深造，那裏的教授告訴他說：以華先生所獲得的成就而論，只須兩年的時光（一般的要三年），就可獲得博士學位，而華先生却沒有入校註冊走這條路。這却使那位教授非常奇怪——遠東來的留美學生，初來時沒有一個不是打算攻博士學位的，怎麼這位學生偏不考慮這個問題呢？華先生在該校旁聽了兩年，聽了將近十門的功課，寫出了將近二十篇的論文，這個成績是可以令人驚異的，因為通常一個留學生，在這段時間內寫得出兩篇論文來就算不錯了！兩年後，抗日民族解放戰爭發生，他就於一九三八年回國，在昆明擔任清華大學教授的職務。由於他的天才和努力，使他在數學方面的才華，得到了更進一步的提高，使全世界上的數學界無不稱不為他在數學上的成就而感到驚異。一九四〇年當他將「堆疊素數論」一書寄到蘇聯當代數學界泰斗維諾格拉多夫教授手裏時，立即就獲得了很高的讚譽。一九四五年這本書的俄文翻譯本在莫斯科出版時，他就應邀赴蘇，此行目的一部分也是在校對這本書：「這本書上的第一面，他要求排印了這樣的幾個中文字：『謹以此書祝中蘇邦交永固。』這幾個在俄文教學書上第一次出現的中文字，是當時國民黨反動政府的大不諱的！回國後，當時國民黨就為他造了許多無耻

的謠言，當時正值國一多教授被刺不久，他為了在安定的環境能更進一步進修自己的工作起見，便於一九四六年赴美，起初曾在普林士頓大學的「數學高級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of mathematics) 做過會員，愛因斯坦也是這個研究院的教授。有人會說過他是愛因斯坦的朋友，但他却很謙遜而鄭重的說：「愛因斯坦我認是認識的，但我那裏能夠做他的平輩人呢？我能做為一個這位七十餘歲的老教授的好學生就算不錯了！」華先生並沒有因為自己在數學上的卓越的天才而驕傲過。

心在祖國

不久他在美國伊利諾大學就任了「終身聘約」的教授，在物質上，除掉了年薪一萬美金以外，還為他預備了豪華而寬敞的住房（包括四間臥室，兩間浴室，一間大足以容五十人開酒會的客廳），在研究工作上，更為他預備了四位助教和一位兩人合用的打字員。照常理講，一個出身清寒的人，在經過半生勞苦之後，能得到這樣一個安適而優裕的環境，是滿可以「獨善其身」的研究下去的，但華先生熱愛祖國的心，却使他無時不在關注着祖國的苦難和發展。等到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以後，他更感到無比的興奮，在極端困難的環境下，他還是託友人在香港為他寄去新中國各種各樣的報章資料。身在太平洋彼岸的華羅庚先生，心是無時不在祖國的。當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以後，他就應美國發動了一次否認蔣廷黻在聯合國的代表資格的運動。

從那個時候起，他就作回國的打算了。但困難的是他與伊利諾大學訂的合同是「終身聘約」，而且他正在草寫一本「解析數論」的初稿，只須半年的時間，就可全部完成，這些都是在那四位助教的協助之下進行的，如果他一旦回來，這本書的進行工作，是會受到阻礙的，但在毛澤東新中國的召喚下，他毅然決然的回到了祖國來。華先生並沒有因為他在美國的「優遇」而放棄了自己對人民應盡的責任。誠如他在香港所發出的給留美學生的公開信內所說的一樣：

「我們身受過移民的限制，膚色的歧視，那是一種是替我們規定了一個圈子。當然有些『傑出』的個人，已經跳出了這圈子，已經特別得到『恩典』，准許『歸化』了。但如果我們心一想，我們的同胞們在被人家欺侮，被人歧視；如因個人的被『賞識』便沾沾自喜，這是何種心

肝？
「朋友們！我們都在有為之年，何不早回去，把我們的精力用之於有用之所呢？
「總之：為了抉擇真理，我們應當回去；為了國家民族，我們應當回去；為了人民服務，我們也應當回去；就是為了個人出路，也應當早日回去，建立我們工作的基礎，為我們偉大的祖國的建設和發展而奮鬥！」

踏上了祖國的疆土

華先生以無比興奮的心情回到了祖國的懷抱，在短促的時期中，他看到了祖國的新生的力量。最使他感動的是：共產黨員刻苦耐勞的作風，年青一代的熱烈的情緒和進步……華先生感到一切都與以前不同了！當他回到清華園的時候，工字廳的老工友老李歡迎他說：「華先生您回來了！？」不久這位工友便告訴華先生說他現在如何努力進步，如何升火爐，如何省煤，「大江流日夜」，華先生看到了我們這個社會正朝着一個新生的方向在一點一滴的變動。

當記者問到他關於中國科學界的前途時，他很興奮的說：「中國科學界的前途很大，就社會科學而論，目前我們社會正在一個變動的時期，不久必有新興而繁榮的社會科學出現。至於自然科學，無可諱言的，由於設備的不足，在某些方面的發展，我們將會受到暫時的困難，但在人民政府領導下，我們總是會慢慢發展起來的！我的看法是，目前我們的自然科學，在應用方面，應該着重於實，在理論方面，則宜慎重於量，研究應該深入。我們應該繼承前人所已有的經驗而向前提高，就好像辯證唯物論之累積哲學上的成就而經馬克斯斯提高一樣。」

「由於客觀的情況，將來中國的理論科學，可能是數學方面的發展比較快，數學為科學之母，數學的發展也就可能刺激應用科學的進步，蘇聯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華羅庚教授回來以後，除了開「初等數論」和「群論」兩門功課以外，還預備向國內數學界介紹最近世界上數學方面發展的趨勢。他打算用深入淺出的辦法來解釋許多數學上深奧的理論。是的，「華羅庚教授回來了！」當年青年人以熱烈的心情來歡迎華先生的時候，華先生是會用為人民服務的工作熱忱來回答這些「歡迎」的！
(四月四日)